



官方微信二维码



智库微信二维码



发展与交流中心二维码



社会调查中心二维码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601 号中惠楼

电话：020-85221755

邮箱：iesr@jnu.edu.cn

官网：http://iesr.jnu.edu.cn

微博：@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自媒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是智库的发声平台，为公众提供更加专业、客观、科学的观点。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发展与交流中心，致力于为政府企事业单位提供专业培训，帮助国内学子申请海外知名学府深造，采用全英语教授数理、经济相关知识，提供免费的专业英语培训。

社会调查中心隶属于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致力于开展多项大型、前沿的社会调查项目，为经济学研究以及政策制定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打造优质的学术公共产品，支撑研究院在相关领域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主编：武茜 徐梦瑶 樊静文

设计：李封乾

校对：冯帅章 崔潇濛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2019 年第四季度（总第十二期）



暨南大学
JINAN UNIVERSITY

IESR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Jinan University



暨南大学 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IESR

季刊 | 2019 年
10-12 月

- ▶ 我院隆重举行四周年院庆总结表彰大会
- ▶ 我院联合南方产业智库合作发布 2019 中国上市房企 60 健康指数
- ▶ 我院受民政部委托赴浙江开展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第三方评估
- ▶ 我院荣获暨南大学 2019 年度文科优秀科研单位
- ▶ 我院学子在第十六届“挑战杯”国赛中荣获二等奖

学院简介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IESR）成立于 2015 年 11 月，是暨南大学为建设高水平大学、推行经济学教育科研国际化而设立的教学科研机构。研究院致力于打造国内一流的应用经济学学科，开展大型社会调查项目，进行国际水准的学术研究，提供高质量本科生及研究生教育，建设高水平智库。研究院聘请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冯帅章教授为院长。2017 年 11 月，研究院荣登《中国智库综合评价 AMI 研究报告（2017）》核心智库榜单。2018 年 1 月，研究院“人口流动与劳动经济学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入选国家教育部与外专局联合实施的“111 计划”。同时，我院名列《2018 年中国智库报告——影响力排名与政策建议》社会类智库专业影响力排名榜前十。

师资建设方面，研究院延揽多名海内外知名高校优秀博士毕业生，聘请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学术影响力的知名学者担任特聘教授，打造一流的国际化师资队伍，构建与国际接轨的考评标准体系。学生培养方面，借鉴北美一流经济系的培养模式设立本科、硕士及博士项目，培养兼具国际视野且立足本国现实国情，能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优秀人才。

为了提升科研实力，研究院成立五大科研机构：微观计量经济学中心、国际贸易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生态文明与环境经济学研究中心、房地产与区域经济学研究中心及劳动经济学研究中心。微观计量经济学中心由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胡颖尧教授担任海外中心主任。国际贸易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由美国杜克大学徐熠教授担任海外中心主任。房地产与区域经济学研究中心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邓永恒教授担任海外中心主任。生态文明与环境经济学中心由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赵金华教授担任海外中心主任。劳动经济学研究中心则以“111 计划”引智基地为重要依托，与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共同创建“芝加哥－暨南人类发展研究联合计划”，由冯帅章教授与 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 James Heckman 教授共同担任负责人。2019 年，James Heckman 教授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

此外，研究院下设三大职能中心：社会调查中心、政策研究中心和发展与交流中心。社会调查中心旨在开展大型社会调查项目，为政策制定及学术研究提供高质量的微观数据。目前已开展的调查项目包括：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中国家庭就业调查、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广东千村调查、广东省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调查等。政策研究中心致力于在数据收集及学术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有关国计民生的热点问题进行相关政策研究，提供高水平的智库服务。发展与交流中心致力于为政府企事业单位提供专业培训，帮助国内学子申请海外知名学府深造，采用全英语教授数理、经济相关知识，提供免费的专业英语培训。目前已与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分校、美国德州 A&M 大学、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纽约城市大学联合开展海外硕士合作项目。

目录CONTENTS

01	学院要闻	
	我院隆重举行四周年院庆总结表彰大会	02
	2019 年度 IESR 最佳论文奖及最佳论文提名奖揭晓	08
	我院受民政部委托赴浙江开展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第三方评估	10
	我院联合南方产业智库合作发布 2019 中国上市房企 60 健康指数	11
	我院党支部多次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集中学习	12
	我院荣获暨南大学 2019 年度文科优秀科研单位	14
02	科研动态	
	论文发表	17
03	学术活动	
	学术会议	18
	名师讲堂	41
	SEMINAR	45
04	思想聚焦	
	观点评论	52
	暨济一堂	73
05	数据调查	
	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	83
	“社会调查与应用”系列讲座	89
06	人物专访	
	名师零距离	92
	IESR 人物	99
07	学生天地	
	“挑战杯”国赛	105
	珠江经济学俱乐部	108
08	对外交流	
	冯帅章院长一行访问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110
	多伦多大学朱晓冬教授来访我院	111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一行来访我院	112
	社会调查中心受邀参加第三届社会抽样调查理论与实务论坛暨社会调查创新发展研讨会	113
09	图说	
	运动会	115

学院 要闻

我院隆重举行四周年院庆总结表彰大会

2019年度IESR最佳论文奖及最佳论文提名奖揭晓

我院受民政部委托赴浙江开展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第三方评估

我院联合南方产业智库合作发布2019中国上市房企60健康指数

我院党支部多次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集中学习

我院荣获暨南大学2019年度文科优秀科研单位

我院隆重举行四周年院庆总结表彰大会



IESR四周年院庆现场

2019年12月2日，冬日暖阳照耀着暨南园，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也迎来了四周年院庆。在这一天，IESR 师生相聚在中惠楼 323 室，共同回顾过去一年 IESR 的发展历程，共同见证它的成长。

IESR 四周年院庆总结表彰大会由副院长张思思主持，冯帅章院长为院庆大会致辞。在致辞中，他首先为 IESR 师生在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点赞。作为暨大最年轻的拥有完整本硕博培养体系的研究院，IESR 师生凭借信心和热情，不断摸索，共同努力，在这个喜庆的日子，每一个 IESR 人都应该为自己、为集体点赞。接下来，冯帅章院长以四个关键词“诚实”、“奉献”、“创新”、“感恩”与大家分享如何让 IESR 更进一步。



冯帅章院长致辞

诚实

冯帅章院长认为诚实意味着忠于事实，不欺骗、不造假。IESR 师生取得的成绩来自扎实的准备，辛勤的努力。冯帅章院长希望将来 IESR 人要将诚实这一品质一以贯之，只有这样才能让所有取得的成绩如坚固的堡垒，经得起任何风浪。

奉献

冯帅章院长指出 IESR 行政团队、教务组、调查中心的同事们很好地诠释了奉献这个词，他们为这一年 20 场学术会议、近百场学术讲座、多项大型社会调查项目以及学生工作的顺利开展付出了辛勤的汗水。

创新

冯帅章院长表示 IESR 成立以来，走的就是不断创新的道路。IESR 打造本硕博完整的培养体系，成立五大研究中心，入选“111”、“民政部政策理论研究基地”……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未来，IESR 还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走这条创新的道路，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不断发展。

感恩

冯帅章院长说道，IESR 这四年的成长需要感恩学校毫无保留的支持，需要感恩 James Heckman 教授等学术界的前辈们，需要感恩所有 IESR 人的努力与付出。同时，他也提醒师生们对自己得到的一切他人给予的帮助与支持感恩。

最后冯帅章院长希望与大家一起，去做一个诚实、奉献、创新、感恩的人，让 IESR 的明天更加美好！

冯帅章院长真挚感人的发言赢得了师生的阵阵掌声。随后，IESR 党支部书记薄诗雨、院长助理卢晶亮、副院长谷一桢、副院长张思思、社会调查中心执行主任李芮、办公室主任张晓从思政工作、科研成果、学生培养、智库建设、调查项目以及行政工作六个方面对 IESR 这一年的成绩进行总结，同时表彰在各个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 IESR 人。



六位负责人进行总结



思政工作表彰



科研成果及科研服务贡献表彰



教学工作表彰



第一届本科教学竞赛表彰



优秀学生表彰



智库建设工作表彰



数据调查工作表彰



行政工作表彰



为庆祝学院成立四周年,加强师生间的互动交流。晚上六点半,IESR学生会组织学院师生在暨南大学曾宪梓科学馆406室举办四周年院庆晚会。在同学们精心的筹办下,会场温馨的布置、生日蛋糕上真挚的祝福以及晚会新颖的“节目+游戏”混合形式,让观众在享受艺术的同时,满怀对IESR的深深爱意,期间更有不少师生拿起手机记录这些美好的时刻。此外,游戏真心话大冒险环节中,在诸如“对IESR哪个老师印象最深刻”等真心话的提问下,学生们纷纷用最细腻的语言表达出他们对IESR的真情实感。最后,晚会在大家的欢笑声中圆满落幕。

IESR从最初成立时的2名全职教师到如今发展成为拥有143名学生,42名全职教师,1名博士后,34名行政、调查中心及政策中心的全职工作人员,共220人的大家庭。作为暨南大学建设广东省高水平大学、推行经济学教育科研国际化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四年的发展过程中,IESR学术影响力及声誉不断提升,智库建设

硕果累累,学生培养模式备受认可,社会调查项目不断拓展。

站在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暨南大学视察,寄语学校坚持自己办学特色的新的历史起点上,IESR将紧抓机遇,整装再出发,奔赴新征程,为擦亮暨南大学金字招牌,为暨南大学经济学科冲刺国内第一梯队,为向社会输送一批批具有“诚实、奉献、创新、感恩”品格的新时代人才而不懈奋斗。



2019 年度 IESR 最佳论文奖及 最佳论文提名奖揭晓



冯帅章院长为陈祎（中）、朱宏佳（左）颁奖

2019 年 12 月 2 日，在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成立四周年院庆总结及表彰活动上，备受关注的 2019 年度 IESR 最佳论文奖和最佳论文提名奖揭晓，副教授陈祎与助理教授朱宏佳的论文分别获得年度最佳论文奖，副教授蔡澍、谷一桢，助理教授薄诗雨、宋彦、马森、张毅的 5 篇论文获得年度最佳论文提名奖。在此，向 8 位教师表达衷心的祝贺！

IESR 创办最佳论文奖评选面向所有尚未取得长聘教职的在职教师，评选教师在过去一年完成或发表的工作论文，旨在表彰、鼓励和认可高质量的学术科研成果。

最佳论文奖

Arrival of Young Talent: The Send-down Movement and Rural Education in China
作者：Yi Chen, Ziyang Fan, Xiaomin Gu, Li-An Zhou

Disguised Pollution: Industrial Activities in the Dark
作者：Sumit Agarwal, Yu Qin, Hongjia Zhu



冯帅章院长为获得最佳论文提名奖的老师颁奖

最佳论文提名奖

Media Attention and Choice of Major: Evidence from Anti-Doctor Violence in China
作者：Shiyu Bo, Joy Chen, Yan Song, Sen Zhou

Microfinance Can Raise Incomes: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in China
作者：Shu Cai, Albert Park, Sangui Wang

Subways and Road Congestion
作者：Yizhen Gu, Chang Jiang, Junfu Zhang, Ben Zou

Cultural Linkages and FDI: Identification from Borders of Chinese Dialect Zones
作者：Sen Ma

Robust Likelihood Ratio Tests for Incomplete Economic Models
作者：Hiroaki Kaido, Yi Zhang

我院受民政部委托赴浙江开展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第三方评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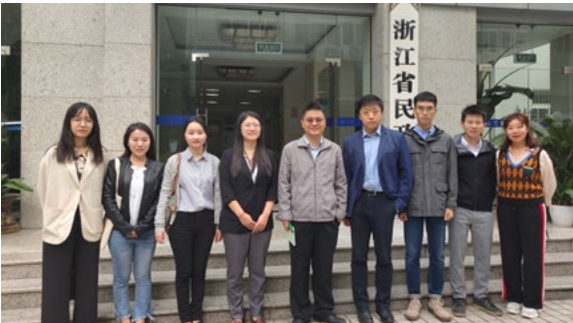
反馈现场双方深入交流

2019 年 10 月 14-18 日，受民政部委托，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工作人员前往浙江省开展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第三方评估。

本次评估工作是我院连续第四年受民政部委托开展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第三方评估。我院评估组由学院骨干全职教师与政策研究中心全职研究人员组成。10 月 14-16 日，评估组实地调研了浙江省 2 个区县共 4 个乡镇，秉持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检查系统、抽查访谈、实地走访、入户访谈等方式，评估当地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开展情况，并从政策制定、机制建立和运行、工作保障、基层儿童工作队伍建设及信息录入、动态管理、宣传引导和社会参与等 7 方面进行针对性考查。

10 月 18 日，民政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带领评估组，赴浙江省民政厅就本次评估工作进行反馈和汇报。冯帅章教授客观全面地介绍了评估结果，指出了两个评估县人民政府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中探索出诸多创新性做法，但两地的留守儿童问题仍然艰巨复杂，还

需进一步发力，做好信息动态管理，规范基层儿童干部的选拔和培训，进一步重视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的关爱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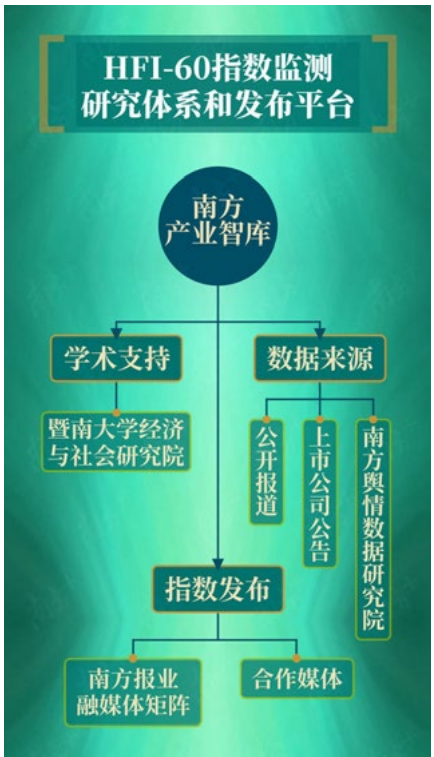
我院一行于浙江省民政厅合影

浙江省民政厅副厅长余强及相关工作负责领导听取了本次评估结果。余厅长表示，评估组工作扎实，作风优秀，评估工作做到了科学、公正，发现了实际存在的问题。接下来民政部门将会根据评估组反映的问题，进一步优化信息系统维护，强化对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的意识，加强对基层儿童工作队伍的培训。

我院联合南方产业智库合作发布 2019 中国上市房企 60 健康指数



2019中国上市房企60健康指数



2019 年 12 月 24 日，南方产业智库发布 2019 中国上市房企 60 健康指数（Healthy Firm Index-60）。该指数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产业智库发布，南方舆情数据研究院提供大数据服务，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提供学术支持，是以关注和推动行业健康成长和城市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目标的综合评价指数。

HFI-60 指数学术支持团队由 IESR 副院长、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思思副教授领衔，团队成员包括我院房地产经济学领域多位骨干力量，包括副教授史炜、助理教授朱宏佳以及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助理谢慧如等。

HFI-60 指数的研究对象是在中国 A 股和港股上市并在广东省境内有房地产投资开发业务的 60 家房地产企业，拟从企业发展中人的要素、组织要素、财务状况、环境要素等不同维度对纳入观察的房企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和评估，从而构建对监测房企健康发展状况的量化综合评估指标体系。指数只认可和接受被研究企业作为上市公司公告的半年和全年业绩和财务报告，结论只代表南方产业智库观察和研究房地产行业的某种角度，并不对所有房企或者一家房企的所有问题和情况提供判断依据。



关于IESR房地产与区域经 济学中心研究团队

房地产与区域经济学中心致力于推进同业界联手，探索社会和业界关心的房地产，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的研究，如住房政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房地产金融、城市更新与改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打造中国和东南亚领先的房地产研究智库，为业界和政府提供探索行业发展和攻克社会难题的务实的研究中心。

扫描二维码即可查看
完整榜单及解读。



我院党支部多次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集中学习

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研究院党支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学校安排部署，紧扣目标要求，精心组织实施，从严从实督导，促进全院主题教育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10月11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二次集中学习

本次学习的内容囊括了主题教育基础知识、习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国共产党章程、重温入党誓词等部分，党支部书记薄诗雨主持了本次活动。

薄诗雨首先为大家再次讲解了主题教育的基础知识。作为一名党员，要时刻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认识到党的基本路线就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意识到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需做到“八个方面”：把党的建设摆在首位，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全面增强执政本领。



集中学习现场



认真听讲的党支部成员们

薄诗雨总结了习总书记在国庆阅兵典礼上的讲话，讲话中强调了“自豪”、“致敬”和“奋斗”三个关键词。70年筚路蓝缕带来了今日的太平盛世，70年艰苦奋斗彰显了中国人民的美好品质，70年中国共产党兢兢业业不断进步，我们为所有付出努力的人民感到自豪，向所有付出过的英烈致敬，也将再接再厉，投入到新的奋斗中去。

再次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后，全体支部成员面对党旗，庄严地重温了自己的入党誓词。

通过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的再次学习，我院党支部成员们对自身的责任和义务有了更多了解，也对新时代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有了更多认识。相信大家会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高度认真的态度投入今后的工作中，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将继续日夜兼程。

10月31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三次集中学习

本次集中学习的主要内容是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党支部书记薄诗雨从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三个方面，为大家做了详尽细致的梳理和总结。

薄诗雨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内容指明了本次学习的方向。“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对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创新创造活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在教育的问题上，要明白教育决定人类未来是教育的本质，因此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以立德树人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以坚持文化自信为发展动力。

实现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战略目标，对于学院来讲，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坚持深化教育改革创新，坚持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加快教育现代化，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扩大教育对外开放。要实现这些目标，就需要学院坚定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通过对习近平总书记教育事业指导思想的一番剖析，在场党支部成员对于自己所承担的教育任务和教育职责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在今后的职业生涯中，IESR 的教职工队伍将坚定坚决跟党走，一门心思办教育，扎实推进人才培养和立德树人的教育进程，为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1月22日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第四次集中学习

主要内容为深入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会上，薄诗雨深入解读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并传达了《中共暨南大学委员会关于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工作方案》，并依照这一工作方案进行了下一步工作部署。

薄诗雨强调，要积极响应国家以及学校的号召，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结合起来，宏观统筹，把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为我院近期主题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要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作为工作导向，引导学院全体师生自觉主动学习，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与维护制度，着力完善和推进学院管理体制建设；要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决定》精神作为强大动力，发扬党员带头作用，结合我院学科优势，开展与人民群众利益切身相关的项目调查，推出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薄诗雨



党支部成员认真听讲

学习结束后，我院党支部成员纷纷结合自身工作谈学习体会，并表示会充分发挥党员带头作用，认真学习全会精神，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融入到学生工作以及课堂当中去，提升教学工作质量和效果，进一步推动学院学科建设、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发展。

通过本次集中学习，我院党支部成员进一步学习和领会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实质和核心要求，提高了政治觉悟，深化了思想认识，自觉把学习全会精神融入到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及日常教学工作当中去，切实推动我院各项工作高质量开展。

我院荣获暨南大学 2019 年度文科优秀科研单位



我院院长冯帅章教授（左三）接受颁奖

2019 年 12 月 4 日，在暨南大学国家社科基金工作会议上，我院荣获暨南大学 2019 年度文科优秀科研单位。

2019 年，我院立足学院发展规划，以加强申报科研项目为抓手，以建设新型独立专业智库为对标发力点，以打造高水平国际化科研平台为根本目标，全力推进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今年以来，我院在科研成果上喜讯频传，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1 项（立项率高达 39%）、省部级项目 3 项、签约横向课题 10 项，新增科研经费 350 余万元；出版编著 1 部、发表论文 20 余篇，其中 SSCI 18

篇，CSSCI 2 篇。智库建设与社会服务成效显著，入选民政部政策理论研究基地（广东唯一民政部政策理论研究基地），名列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核心智库全国社会类智库专业影响力排行榜前十。

本次获评优秀科研管理单位，是学校对我院过去一年中科研工作的肯定与支持，同时也为我院科研工作的管理与发展指明了方向，我院将以此为动力，锐意进取，继续努力，力争为学校科研事业发展与“双一流”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科研 动态

论文发表

论文发表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我院助理教授刘丛的独立作者论文 “The Effects of WWI on the Chinese Textile Industry: Was the World's Trouble China's Opportunity?” 被经济史领域顶级期刊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接受发表。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我院助理教授薄诗雨、宋彦的合作论文 “Media Attention and Choice of Major: Evidence from Anti-doctor Violence in China” （合作者：Joy Chen, Sen Zhou）被国际权威期刊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接受发表。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我院教授冯帅章、助理教授韩昱洁的合作论文 “The Effect of Primary School Type on the High School Opportunities of Migrant Children in China” （合作者：Yuanyuan Chen）被国际权威期刊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接受发表。



我院副教授陈伟的合作论文 “Estimating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Urban China: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Schooling Reform” （合作者：Sheng Jiang, Li-an Zhou）被国际权威期刊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接受发表。

学术活动

【学术会议】

【名师讲堂】

【SEMINAR】

学术会议

“布鲁金斯 - 暨南”中国微观经济学论坛



会议现场

2019 年 10 月 11 日 -12 日，首届“布鲁金斯 - 暨南”中国微观经济学论坛在 IESR 召开，这是我院与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库之一布鲁金斯学会的首次合作。来自布鲁金斯学会、亚利桑那大学、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未来资源研究所、康奈尔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院校的专家学者们齐聚 IESR，参与了本次论坛。本次论坛聚焦中国环境经济与政策领域的多项重要议题，通过深度讨论的模式为相关政策的制定与效果评估提供参考。

会议伊始，IESR 冯帅章院长对参会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希望今后与布鲁金斯学会能够在经济学及政策研究等领域有更多合作与交流。

在本次论坛上，学者们分别就中国制造业的环境污染、尾气排放导致的空气污染、秸秆燃烧等问题及相关



冯帅章院长

的环境政策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论坛设置的点评环节为参与者提供了观点交锋的平台，分享环节结束后的群体讨论环节，也为学者们进行深入沟通创造了机会。



Hui Zhou (Cornell University) 分享了题为“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r Local Protectionism? Evidence from Tailpipe Emission Standard in China”的报告。



Caixia She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分享了题为“Pollution Mitigation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的报告。



Brian Viard (Cheung Kong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分享了题为“‘How Extensive are Air Pollution Spillovers? An Application to China’s Manufacturing Productivity’”的报告。



Peng Zhang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分享了题为“‘The Effect of Air Pollution on Body Weight and Obesity: Evidence from China’”的报告。



Yao Pa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分享了题为“‘Late-life Cognition: Do Childhood Conditions Play Any Role?’”的报告。



Wangyang Lai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分享了题为“‘Indoor Air Pollution and Mortality Rates: Evidence from Natural Gas Pipelines Expansion in China’”的报告。



Qu Tang (Jinan University) 分享了题为“‘Behind the Flames: Unintended Impacts of Straw Burning on Human Capital’”的报告。



Clifford Winston (Senior Fellow in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基于学者们的报告，在场专家给出了针对性的点评和建议。

布鲁金斯学会 (Brookings Institution) 成立于 1927 年，总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是美国著名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其规模之大、历史之久远、研究之深入，被称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库”。其宗旨是开展高质量的独立研究，并据此提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实用性的政策建议，以高质量的思想产品、全方位的市场营销、政策实业家的卓越领导力被誉为最有影响力、最值得借鉴和最受信任的智库。

本次与布鲁金斯学会的合作，是 IESR 在智库建设方面的又一次成功探索，为中国环境污染的治理模式提出了诸多思考，也为下一步环境治理的政策制定提供了新的思路。



David Brownston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Ashley Langer (University of Arizona)



Richard Morgenstern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外来人口市民化”研讨会



会议现场

2019 年 11 月 15-16 日，由中国人口学会人口迁移流动与城镇化专业委员会主办，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承办的“外来人口市民化”研讨会于暨南大学曾宪梓科学馆 406 室顺利举办。来自中国社科院、广州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公室、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广州地理研究所、中央财经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香港大学等机构和院校的二十余名专家学者齐聚 IESR，共同探讨“外来人口市民化”这一焦点议题。

会议伊始，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中国人口学会人口迁移流动与城镇化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冯帅章教授发表致辞，他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转达了专业委员会主任王谦对于本次会议的支持和期待。王谦主任表示，人口迁移流动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常态，这一议题十分重要。但目前对迁移流动所涉及的人口、社会经济等很多方面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不够，未来专业委员会将举办更

多研讨会及论坛来更好地促进学者们的交流。他希望各研究机构以及广大的研究人员在迁移流动研究方面继续投入力量，专业委员会一定为大家服务好，搭建好交流研讨的平台。

接下来，针对“外来人口市民化”的议题，专家学者们带来了如下报告（按报告顺序）：



王春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进行了题为“第三条城镇化道路：城乡两栖现象”的报告。



卢晶亮（暨南大学）进行了题为“流动人口与城镇居民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差异”的报告。



刘厚莲（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进行了题为“我国特大城市人口调控实践与优化”的报告。



葛国斌（广州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公室处长）进行了题为“广州市流动人口卫生健康服务宣传教育痛点、难点问题分析及对策建议”的报告。



侯佳伟（中央财经大学）进行了题为“粤港澳大湾区人口发展的机遇与挑战”的报告。



梁文泉（暨南大学）进行了题为“中国移民汇款：1995-2015年”的报告。



李欣（南京农业大学）进行了题为“住房政策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住房支付能力与产权决策的影响研究”的报告。



韩嘉玲（暨南大学，北京社科院）进行了题为“融入与挑战：在中国的东南亚跨境妇女”的报告。



张翠玲（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进行了题为“城市流动人口的异质性及生育率——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报告。



刘于琪（香港大学）进行了题为“向上比较还是向下比较：中国流动人口的经济社会地位和主观幸福感”的报告。



杜志威（广州地理研究所）进行了题为“快速城镇化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阶段与行为特征——基于广东省东莞市的调查”的报告。



汤兆云（华侨大学）进行了题为“农民工公共医疗服务选择的代际比较——基于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苏沪浙三省数据”的报告。

最后，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社会调查中心副主任薛森为大家介绍了社会调查中心及目前的课题数据情况。目前，社会调查中心主要开展的调查项目包括：广东人口流动现状调查、广东千村调查、广东省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调查、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中国家庭就业调查等。这些调查关注城乡迁移人口、劳动力市场、制造业企业、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等社会热点议题，与国家、各级政府的政策需求高度契合。此外，社会调查中心还在积极探索大数据与调查数据的结合应用，以求更好地提升微观数据库的社会效益和学术价值。



冯志坚（衡阳师范学院）进行了题为“市场分割、地区差异与农民工创业收入效应”的报告。



薛森

学者们的报告内容质量颇高，在场成员在认真聆听之后，不断提出问题与报告人互动，现场气氛热烈。

11月16日下午，研讨会参会成员赴广州市天河区石牌村（广州市最大的城中村之一）实地考察。参会嘉宾在社会调查中心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参观了石牌村的池氏宗祠等地，在调查中心工作人员的介绍下，参会嘉宾对当地的历史、外来人口和治安等情况有了系统的了解。



王海宁（中山大学）进行了题为“同伴效应：农村留守儿童的外部性”的报告。



实地考察石牌村和池氏宗祠

21世纪以来，我国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经济社会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其自身和家庭也有着深远影响。在此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实现外来人口的市民化，提升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度，是关乎我国新时期下城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问题。本次研讨会就

这些问题进行了数据上的分享和思想上的碰撞，参会嘉宾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与研究对外来人口市民化问题的解决贡献了一份力量。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外来人口相关的社会问题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

2019 广东千村调查报告研讨会

2019年11月24日，由我院主办的2019年广东千村调查报告研讨会于暨南大学中惠楼106会议室顺利举办。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钱文荣，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谭淑豪，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应恒，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特聘教授韩嘉玲受邀此次会议，共同探讨广东乡村的现状问题和发展走向，并就报告的研究方向、内容等提出相关建议。本次会议由IESR副院长张思思主持。

会议伊始，我院院长冯帅章教授致辞。他首先对参加本次会议的嘉宾表示热烈欢迎，随后介绍了千村调查



院长冯帅章致辞



专家学者合影留念

的相关情况。他表示非常珍惜本次与专家们交流合作的机会，会议帮助千村调查的研究团队继续完善调查研究的各项工作，把千村项目做实做好做精，为广东乃至全国的乡村振兴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随后，社会调查中心执行主任李芮、副教授卢晶亮、助理教授李承政、唐高洁、李书娟、马祥、研究助理张亚楠依次介绍了千村调查项目的样本情况，以及相关初步研究成果。

专家们对本次研究报告表达了充分的认可和肯定，并结合自身对乡村振兴的见解向各位发言人提出了改进完善建议。研究团队认真听取专家们的宝贵建议的同时，也对项目的进一步完善进行了讨论。

研讨会的召开，不仅是为了更好地完善 2019 年广东千村调查项目的研究成果，更是专家学者对于广东省乃至国家乡村振兴这一时代热点话题的思想碰撞，对助推乡村振兴，早日实现农村的强、美、富的深切期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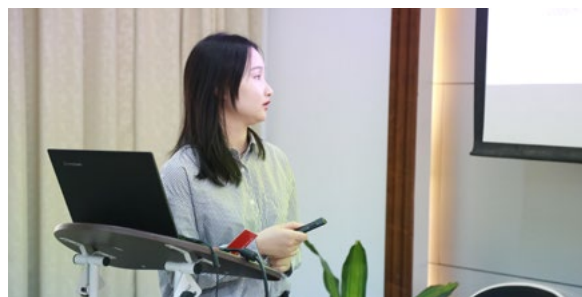
据了解，继 2018 年成功发起广东千村调查以来，2019 年我院发起了第二轮调查。调查致力于收集广东乡村经济收入、乡村治理、教育养老、生态环境建设、精准扶贫等方面的数据，期间共走访了广东省 300 多乡村，回收了 3000 多份有效数据，并从数据中发掘问题，为广东省乡村发展献计献策。



社会调查中心执行主任李芮



副教授卢晶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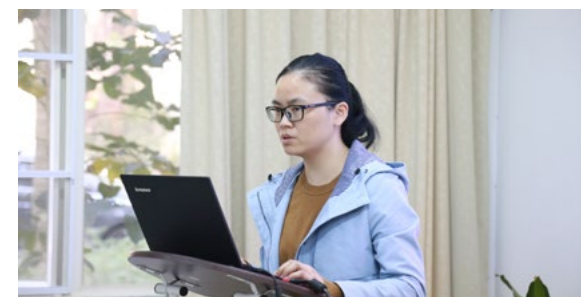
助理教授唐高洁



助理教授李承政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
发展学院教授谭淑豪



助理教授李书娟



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应恒



助理教授马祥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暨南大学
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特聘教授韩嘉玲



研究助理张亚楠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国
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钱文荣

2019 城市经济学研讨会



与会嘉宾合影

2019 年 11 月 29 日，我院主办的 2019 城市经济学研讨会在暨南大学曾宪梓科学馆 406 会议室顺利召开。来自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复旦大学、厦门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暨南大学、南京审计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国内外高校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城市经济学热点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至此，2019 城市经济学研讨会圆满结束。与会嘉宾围绕企业、住房、土地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热点话题进行广泛讨论与深入交流，研讨会上各位专家学者思想的交流、智慧的碰撞，为城市经济学热点问题的解决拓展了新的思路。



会议现场讨论



Shimeng Liu（暨南大学）分享了题为“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dustries and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Cities”的报告。



Wei Xiao（西南财经大学）分享了题为“Urban Bia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Land Policy in China”的报告。



Chun Kuang（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分享了题为“Public Capital and Firm Performance: Micro-Evidence from China's High-Speed Rail”的报告。



Jianfeng Wu（复旦大学）分享了题为“Political Connection and Land Misallocation: Evidence from the Urban Land Quota System in China”的报告。



Yatang Lin（香港科技大学）分享了题为“Affordable Housing, Local Labor Market and Retail Amenities”的报告。



Wei Shi（暨南大学）分享了题为“An Analysis of the Spatial Price Competition among Real Estate Developers”的报告。



Minhong Xu（南京审计大学）分享了题为“Do Earthquakes Shake Mortgage Lenders' Risk Perception?”的报告。



Shiyu Bo（暨南大学）分享了题为“On Intergovernmental Communication: A Tale of Two Decentralization Reforms”的报告。

第 13 次“中国劳动经济学者论坛”季会



与会嘉宾合影

2019 年 11 月 30 日，第 13 次“中国劳动经济学者论坛”季会在暨南大学中惠楼隆重召开。本次论坛由中国劳动经济学者论坛理事会主办，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承办。来自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暨南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国内高校的 40 余位专家学者在会议中分享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

冯帅章教授首先向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接着，他简单介绍了暨南大学和 IESR 的基本情况，并表示 IESR 对于此次能够承办本次会议感到非常荣幸。他相信在这场高水平的学术交流盛宴中，参会嘉宾的交流和讨论会进一步推动劳动经济学在研究领域与政策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共同为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和推动。



冯帅章教授

会议开幕式上，IESR 院长冯帅章教授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劳动经济学者论坛理事会主席秦雪征教授致开幕辞。



秦雪征教授

秦雪征教授在致辞中提到本次会议主题为劳动力市场改革与政策评估，这一主题受到了学者们的热烈响应，共收到 40 余篇稿件，创历次季会投稿数量新高。同时，

论文作者来自全国各地，涉及的主题既有人口、流动、养老、社保等经典话题，也有方言技能、家政市场服务等比较新潮的话题，非常值得期待。秦雪征教授表示非常高兴本次会议由 IESR 承办，期待未来继续与 IESR 保持合作。

随后，研究报告与评论环节于两个平行会场同时进行。与会嘉宾就医疗保障、教育养老、就业与失业保障、家庭金融与消费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中山大学谢佳松（左）分享了题为“乡音无改，关山难越？”的报告，IESR 马森（右）进行点评。



四川大学赵绍阳（左）分享了题为“社保降费对企业的影响——基于浙江省社保降费的实践”的报告，上海财经大学宗庆庆（右）进行点评。



西南财经大学王泽荣（左）分享了题为“Interethnic Marriage and Integration of Migrants in Urban China”的报告，IESR 杨哲（右）进行点评。



暨南大学梁文泉（左）分享了题为“不安居，则分居：为什么大城市会增加移民夫妻异地分居？”的报告，四川大学赵绍阳（右）进行点评。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石雪竹（左）分享了题为“The Role of Social Norms in Old-age Support: Evidence from China”的报告，暨南大学吴贾（右）进行了点评。



上海财经大学宗庆庆（左）分享了题为“我国城市家政市场的工资：基于街道层面需求数据的证据”的报告，IESR 陈祎（右）进行点评。



浙江科技学院叶俊焄（左）分享了题为“居住隔离视角下城中村与农民工职业表现的内在逻辑与实证”的报告，IESR 卢晶亮（右）进行点评。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于佳欣（左）分享了题为“灵活安全性养老保险政策效果评估：来自灵活就业者统筹账户返还试点的证据”的报告，江西财经大学彭树宏（右）进行点评。



上海财经大学董彩婷（左）分享了题为“高等教育扩招对农村教育机会和回报的影响”的报告，IESR宋彦（右）进行点评。



江西财经大学彭树宏（左）分享了题为“失业保险与家庭股市参与”的报告，IESR陈思宇（右）进行点评。



安徽大学徐晓红（左）分享了题为“家庭收入如何影响子女教育年限？——基于生命周期的视角”的报告，华南农业大学张同龙（右）进行点评。



暨南大学郑筱婷（左）分享了题为“Does Charitable Giving Make People Happy?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的报告，浙江科技学院叶俊焄（右）进行点评。



华南农业大学张同龙（左）分享了题为“孩子数量与质量间的权衡取舍存在吗？”的报告，参会人员自由点评。



中山大学王海宁（左）分享了题为“同伴效应：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外部性”的报告，安徽大学徐晓红（右）进行点评。

劳动经济学所涉及的话题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联系紧密，本次会议主题劳动力市场改革与政策评估更是极具学术与政策价值。会议论文汇报与讨论时间充足，为长期从事我国劳动经济学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高质量的学术展示与交流的平台，更为探索如何进一步深化我国劳动力市场在人口、流动、养老与医疗保障等领域的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借鉴。

大数据在经济研究中的应用研讨会



与会嘉宾合影

2019 年 12 月 5 日，由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香港浸会大学商业数据分析与数字经济研究中心（CBADE）及经济学系联合主办的大数据在经济研究中的应用研讨会在暨南大学曾宪梓科学馆 406 室顺利举行。来自北京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暨南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国家知识产权局、BVDinfo 以及 Patentics 等国内知名高校和相关机构的 30 余位专家学者受邀参会。本次会议旨在为广大经济学学者搭建高水平的数据交流平台，探讨如何更好地将大数据应用在经济学的各项研究中。



会议现场座无虚

距离会议召开还有三十分钟，会议室门口已站满了来自各大高校的师生学者，他们慕名前来，迫不及待准备参与这场高含金量的学术盛宴。“在网上了解到这个研讨会会在暨大召开，就特意留下来参会学习了！”一位从外地赶来，刚参加完 IESR 上周主办的第十三次“劳动经济学者论坛”季会的高校学生激动地告诉笔者。

会议伊始，IESR 院长冯帅章教授和 CBADE 主任钟剑修教授分别进行致辞，言简意赅地向与会嘉宾介绍了 IESR 数据情况和 CBADE 中心情况。



冯帅章教授致辞

冯帅章教授表示非常珍惜本次与专家们交流合作的机会，会议将为 IESR 在探索大数据与调查数据结合应用的道路上提供更加专业的方向，有助于进一步提升 IESR 微观数据库的社会效益和学术价值。同时，他也希望本次研讨会不仅是 IESR 与 CBADE 开展长远、深度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的起点，更是建设中国高质量数据共享平台的星火发源。



钟剑修教授致辞

钟剑修教授表示，十分荣幸能够与 IESR 合作共同举办本次研讨会，这给刚成立不久的 CBADE 提供了一次很好的成长机会。他介绍到，CBADE 立足本地企业经济发展，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把香港当地企业现状问题作为研究的主要方向，以解决企业现实问题为首要教学任务，为当地知名企业输送高质量人才，保障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他强调，大数据研讨会的开展不能止步于此，应该长期办下去并把它办好办精。同时，他也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与各高校能保持长期友好的交流合作，集思广益，共同推动国家经济学的高质量发展。

致辞过后，会议报告环节正式开始。



何李芮（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介绍广东千村调查、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



刘冲（北京大学）介绍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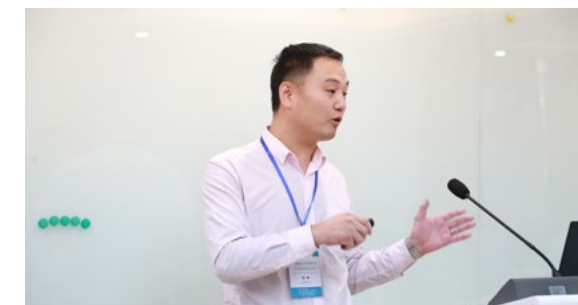
毛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介绍企业微观调查数据。



鲁雪松（BVDinfo）介绍Orbis企业、专利数据库。



祁涵（香港浸会大学）介绍海关及贸易大数据。



郭峰（上海财经大学）介绍中国知网学术发表大数据。



裘钢（Patentics）介绍智能语义-专利检索。



曹赞华（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专利大数据的应用场景。



曹光宇（北京大学）介绍基于互联网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以共享单车为例。



刘丛（暨南大学）介绍经济史数据。



王睿新（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介绍中国企业创业创新调查（ESIEC）与数据开发问题。



李唐（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介绍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CEES）。



马森（暨南大学）介绍污染及气象数据。



陈婷（香港浸会大学）

本次会议组织者之一 CBADE 副主任陈婷表示会议能够圆满召开离不开 IESR 的精心筹划和各位嘉宾学者的共同参与及大力支持。研讨会主题报告和专家的讨论点评干货满满，精彩纷呈，达到了会议预期的目的。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如何应对大数据在经济研究中的广泛应用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经验研究提出了

新的要求，与会专家学者们已通过研究讨论提供了部分方向和答案。同时，本次研讨会也为在场的专家学者分享了多个不同研究领域的高质量数据库，为进一步探索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了一份力量。

香港科技大学 - 暨南大学 2019 宏观经济学学术会议

2019 年 12 月 17 日 -18 日，香港科技大学 - 暨南大学 2019 宏观经济学学术会议在暨南大学中惠楼 106 会议室顺利召开。香港科技大学 - 暨南大学宏观经济学学术会议每年在两校各举办一次，这是双方第三次进行深度合作。本届会议邀请来自华盛顿州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乔治城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北京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暨南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的专家学者就宏观经济学前沿研究和热点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会议伊始，IESR 院长冯帅章教授致开幕词。他首先对参会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随后介绍了会议的相关情况，讲述了举办宏观经济学学术会议的初心以及对会议未来的展望。



冯帅章院长致辞

在接下来的两天日程中，与会专家学者就各自在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作展示汇报。



Yi Wen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进行题为 “What Does Financial Crisis Tell Us About Exporter Behavior and Credit Reallocation?” 的主题演讲。



Neng Wang (Columbia University) 进行题为 “Leverage Dynamics and Financial Flexibility” 的主题演讲。



Kai Li (HKUST) 进行题为 “Leasing as a Risk-Sharing Mechanism” 的报告。



Ye Li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进行题为 “Intermediated and Public Supply of Liquidity” 的报告。



Shu Lin (CUHK) 进行题为 “A Spare Tire for Employment: Corporate Bond Issuance in China” 的报告。



Quan Wen (Georgetown University) 进行题为 “The Macroeconomic Uncertainty Premium in the Corporate Bond Market” 的报告。



Yan Ji (HKUST) 进行题为 “Nondispersive Uncertainty, Credit Misallocation, and Endogenous Disasters” 的报告。



Dan Cao (Georgetown University) 进行题为 “Fisherian Asset Price Deflation and the Zero Lower Bound” 的报告。



Winston Dou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进行题为“Predation or Self-Defense? Endogenous Competition and Financial Distress”的报告。



期间，与会专家学者根据报告内容展开热烈讨论，并为演讲学者提供有价值的意见与建议。



Yan Xiong (HKUST) 进行题为“Information Bias in the Proxy Advisory Market”的报告。



嘉宾交流讨论

自 2018 年 IESR 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举办首届宏观经济学学术会议以来，会议的召开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反响，得到广泛赞同和认可。IESR 也将把宏观经济学学术会议作为学院固定的学术活动持续举办下去，将之打造成为宏观经济学交流研讨的重要平台，为国内宏观经济学在理论及应用研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Xuewen Liu (HKU) 进行题为“Delayed Crises and Slow Recoveries”的报告。



与会嘉宾合影



Byoungchan Lee (HKUST) 进行题为“Wealth Inequality and Real Interest Rates”的报告。

国家级科研项目申请经验交流会



与会嘉宾合影

为切实做好 2020 年度国家级科研项目申报工作，进一步提高我院国家级科研项目申报质量，2019 年 12 月 21 日，我院在中惠楼 106 会议室成功召开国家级科研项目申请经验交流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封进、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罗知、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马光荣、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徐舒、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副教授张勋、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助理教授宋伟受邀莅临暨南园，与我院教师一同交流探讨国家级科研项目申请工作。



卢晶亮副教授致辞

会议伊始，本次会议的主持人卢晶亮副教授首先对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与感谢，随后介绍了我院师资队伍以及 2019 年度国家级科研项目申报立项概况。

本次交流会分主题演讲与报告点评两个环节进行，在主题演讲上，封进教授与马光荣教授分别分享了他们在国家级科研项目申报中的成功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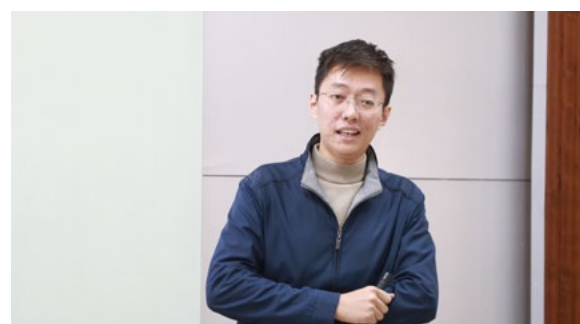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封进分享
国家级科研项目申请经验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马光荣分享国家级科研项目申请经验

在接下来的报告点评环节中，我院教师分别汇报了各自的项目申请计划，并与嘉宾展开深入交流，切实解决项目申请过程中所出现的难点问题。



我院教师分享项目申请计划

一直以来，我院高度重视国家级科研项目申报工作，多次召开项目申请经验交流会，为教师搭建高质量的信息交流平台，成效显著。近年来，国家级科研项目立项数量稳中有升，在研项目数量逐年增多。最后，祝愿我院教师们在 2020 年度国家级科研项目申报工作中再创佳绩！

名师讲堂

计量经济学高阶训练营



授课现场

2019 年 12 月 9 日，由 IESR 微观计量中心主办的计量经济学高阶训练营在暨南大学曾宪梓科学馆 406 会议室正式开营。麻省理工学院 Whitney Newey 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Bryan Graham 教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胡颖尧教授三位顶级名师莅临暨南园授课，与学员们共同开启一段为期五天的计量经济学之旅。

在活动宣传前期，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上海财经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多个国内顶尖高校的师生纷纷向 IESR 投递课程报名表，训练营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训练营开营当天，现场氛围火爆，共计 50 余名学员前来参与课程学习。

Whitney Newey 教授以“Machine learning and nonparametrics”为主题向学员展示了当前机器学习和计量经济学的融合。



Whitney Newey教授



Bryan Graham教授以“Network and social interactions”为主题向学员展示了计量经济学在网络和社会互动模型中的最新发展。



胡颖尧教授以为“The econometrics of unobservables”为主题详细讲解了潜在变量模型的计量方法。



学员认真听讲

本次训练营组织者 IESR 助理教授张毅告诉笔者，为了让学员能够深入、系统地学习计量经济学前沿知识，训练营特别邀请在计量经济学方面颇有建树的这三位教授针对机器学习、社交网络等重点难点开展主题授课。除此以外，训练营还组织了一场学术报告研讨会，学员们能够充分展示自己的研究，与计量经济学顶级学者面对面交流，得到切实宝贵的建议。

走进讲座现场，笔者顿时被现场热烈的学习氛围所感染。授课中，教授们风趣幽默，深入浅出地向学员们传授知识。在遇到一些难点时，他们会结合当下热点话题以及特殊案例进行分析讲解，让原本乏味难懂的知识点“活”了过来，变得生动有趣，通俗易懂。在理论与案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下，学员们可以及时地回归到高度集中的学习状态。

四天下来，紧凑的课程丝毫不影响学员的学习热情。他们惜时如金，充分利用课间的休息时间，及时与教授交流探讨课程上的难点问题和平时做科研时遇到的挑战。



学员与Whitney Newey教授课间交流



学员与授课教授课间交流

笔者在现场随机采访了两位学员，他们表达了参与训练营的真切感受。

一名计量经济学在读博士生张同学表示：“听完训练营中的12场讲座，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我是一名计量经济学在读博士生，对计量经济学模型理论和实证研究方法都在持续摸索中，非常开心能够来到参加这次的训练营，也非常幸运借训练营这个平台能够与三位顶级名师大咖面对面交流学习。课程不负所望，安排非常科学，名师理论观点十分新颖。在这过程中，我获取了很多新知识，为未来所做的学术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特别要说的是，训练营的三位教授都超级 nice，不论问题大小，都会非常认真、耐心地为学员解疑答惑。”

来自暨南大学的宋同学分享道：“三位教授或许所擅长的研究方法不同，但每一位都是乐于分享的学者！讲座的质量非常高，不是照本宣科，不是知识的简单搬用，而是注入了很多个人经验的整理与再创造。另外，每场讲座的内容都非常充实，所呈现给我们的都是重要的知识点，需要我们反复听、反复琢磨以及未来加以实践才能逐渐消化吸收。”

本次计量经济学高阶训练营已接近尾声，训练营的课程也得到了学员的认可与好评，IESR 微观计量中心将以此作为动力，持续为计量经济学领域的学者提供更多学习交流的高质量平台。

训练营的最后一天，由 IESR 微观计量中心主办的计量经济学高阶训练营之学术报告研讨会在暨南大学曾宪梓科学馆 406 会议室顺利举办。来自上海财经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农业大学、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的五位学者就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分享。麻省理工学院 Whitney Newey 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Bryan Graham 教授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胡颖尧教授三位顶级名师莅临现场指导。



Liang Chen (上海财经大学) 分享了题为“Quantile Factor Modeling”的报告。



Ji-Liang Shiu (暨南大学) 分享了题为“An Optimal Linear Rank Index for a Latent Variable”的报告。



Wei Shi (暨南大学) 分享了题为“Modeling Social Interactions with Network Dependent Interaction Strength”的报告。



Tong Zhang (华南农业大学) 分享了题为“Social Trust Formation and Access to Credit among Rural Households in China”的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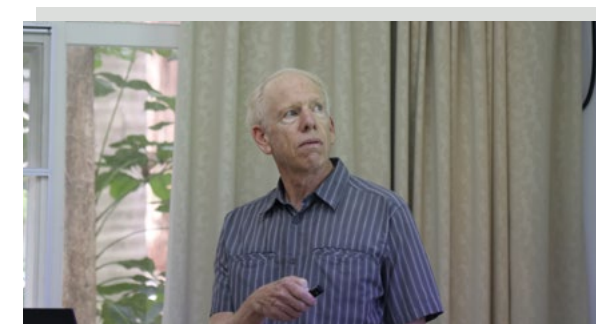
Xi Wang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分享了题为“Nonparametric Estimation of Generalized Transformation Panel Data Models with Fixed Effects”的报告。

期间，教授及学员们针对演讲内容展开了讨论，并给予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研讨会的举办，为训练营学员们提供了一次高质量的学术交流机会。在教授和学员们热烈的讨论中，本次为期 5 天计量经济学高阶训练营圆满落幕。

SEMINAR

【Seminar 第 182 期】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授 David Brownstone: Aggregation Bias in Discrete Choice Models



【Seminar 第 183 期】
亚利桑那大学助理教授 Ashley Langer: Escalation of Scrutiny: The Gains from Dynamic Enforcemen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Seminar 第 184 期】
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江明: Chinese College Admissions Reforms: An Empirical Evaluation



【Seminar 第 185 期】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孟昕: Parental Absence in Childhood and Adult Criminal Behavior: Evidence from Survey and Experimental Data from Prison Inmates in China



【Seminar 第 186 期】
昆山杜克大学副教授崔静波：
China's ETS Improves Firms'
Competitiven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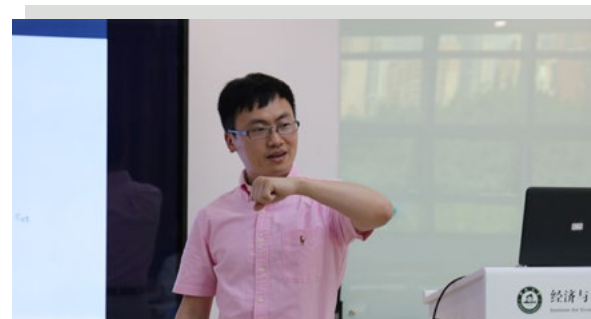
【Seminar 第 187 期】
厦门大学副教授许杏柏：Large Sample
Properties of Bayesian Estimation of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s



【Seminar 第 188 期】
西南财经大学副教授肖伟：Measuring
Urban Bias in Capital Alloc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Seminar 第 189 期】
美国俄勒冈大学助理教授邹咏辰：Wind
Turbine Syndrome: The Impact of
Wind Farms on Suicide



【Seminar190 期】
多伦多大学教授朱晓冬：Selective
Migration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Gap: Evidence from China



【Seminar191 期】
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钟松发：Putting
Preference for Randomization to
Work



【Seminar192 期】
延世大学助理教授 Jiseob Kim：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the
Mortgage Refinance and the Home
Equity Lines of Credi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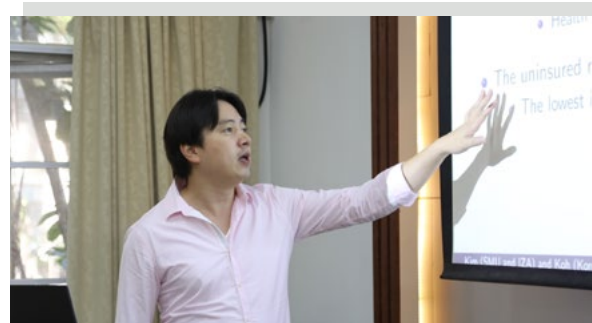


【Seminar193 期】
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楚军红：
Making Lemonade from Lemons:
Taxi Drivers' Response to
Cancellations and No-shows



【Seminar194 期】

新加坡管理大学助理教授 Seonghoon Kim: The Effects of the Affordable Care Act Medicaid Expansion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Seminar195 期】

上海交通大学助理教授黄雯馨: Beat the Midpoint: Heterogeneity in Bid-Ask Long-Run Equilibriu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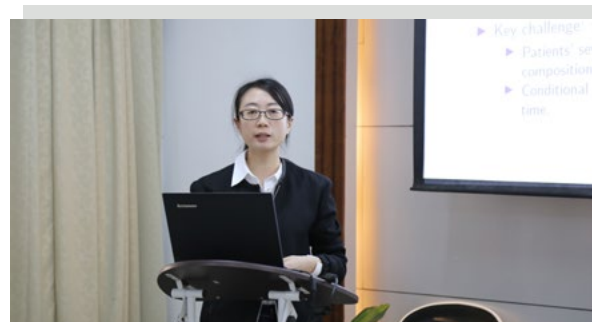
【Seminar196 期】

香港大学助理教授罗晔: Many Inequalities Selection via Machine Learning



【Seminar197 期】

厦门大学助理教授周晓露: Upcoding under Diagnosis-based Price: Evidence from China Public Health Insurance Programs



【Seminar198 期】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授 Richard J. Arnott: Welfare Economics of the Basic Bathtub Model



【Seminar199 期】

香港浸会大学教授朱力行: Model Checking for Parametric Single-index Models: A Dimension Reduction Model-adaptive Approach



【Seminar200 期】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赵丽秋: Un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 in Early Lif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Skills



【Seminar201 期】

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 Haoming Liu: Willingness to Fight on: Environmental Valuation in Dynamic Competition



【Seminar202 期】

埃默里大学副教授陈凯迹：Aggregate and Distributional Impacts of Housing Policy: China's Experiment



【Seminar203 期】

新加坡管理大学助理教授 Matthew Shapiro：Density of Demand and the Benefit of Uber



【Seminar204 期】

耶鲁大学助理教授陈希：Does Gender Matter for Quality of Healthcare? A Standardized Patient Audit Study



【Seminar205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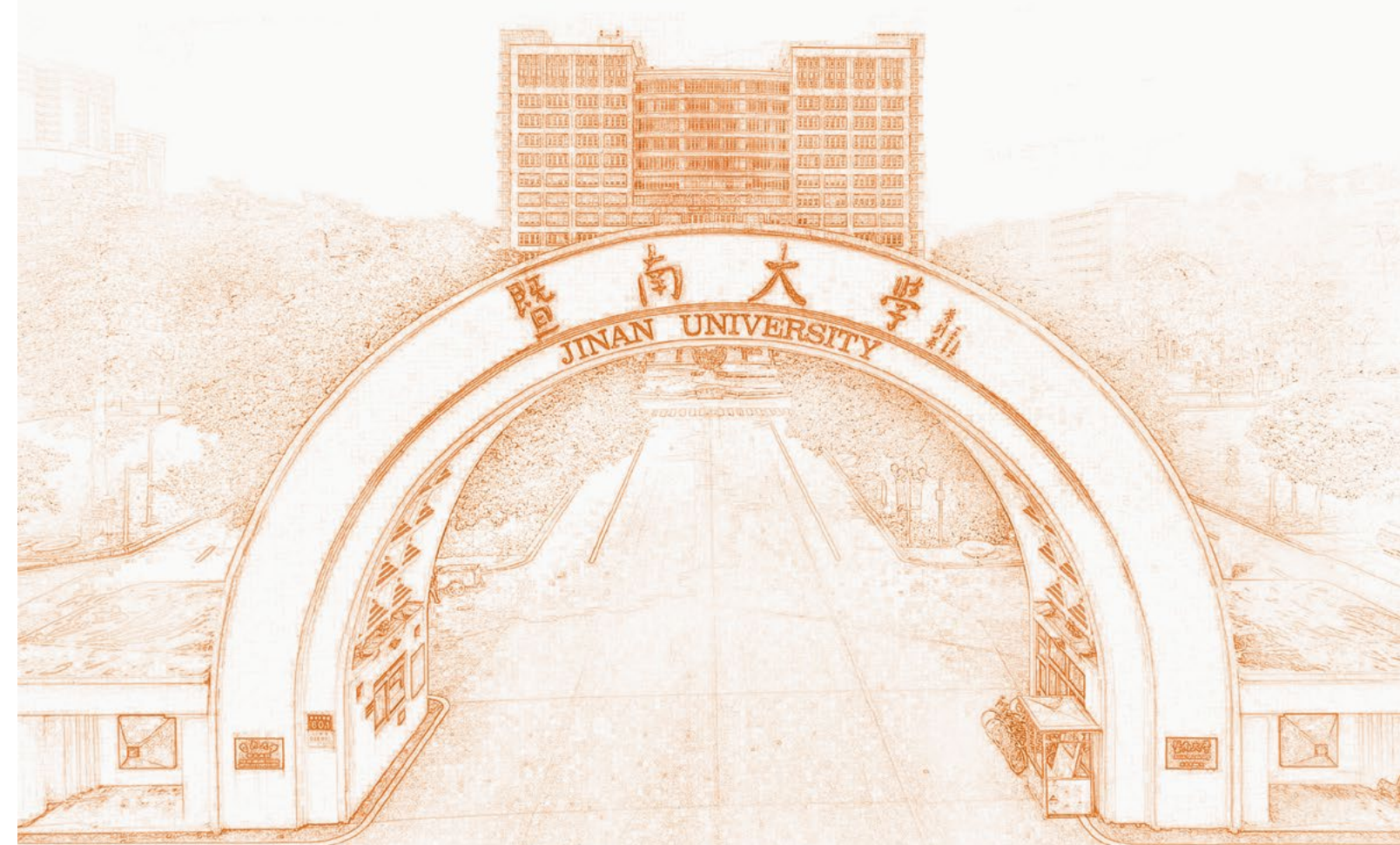
西南财经大学副教授叶菁菁：Fertility Response to the Relaxation of China's One-Child Policy



思想 聚焦

【观点评论】

【暨济一堂】



观点评论

【对话】韩嘉玲：农村小规模学校蝶变与探索的中国经验



农村学校（网络图片）

编者按：农村小规模学校（也叫乡村小规模学校、微型学校、微校或小校等）主要指不足 100 人的村小学和教学点。截止 2017 年年底，我国有农村小规模学校 10.7 万所。乡村小规模学校是我国教育体系的“神经末梢”，在服务农村最困难群体、巩固提高义务教育普及水平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韩嘉玲老师系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讲座教授，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她的研究领域为农村发展、农村教育、人口迁徙、社会发展等。她因在扶贫领域研究及实践中的突出成绩，获得 2004 年中国消除贫困奖科研奖。近年来，韩嘉玲老师关注中国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与变革，其主编的《小而美：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变革故事》于今年付梓，IESR 特对

韩嘉玲老师进行了专访，整理校对后经韩嘉玲老师同意，发布于此，以飨读者。

一、“农村调查中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您一直以来关注农村问题，最初为什么对农村产生兴趣？

韩：我是一个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典型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对农村世界根本不熟悉。1991 年在北大读博时我的研究方向是发展研究，我同级的同学们多半都有上山下乡的农村经验，因此每每在争论有关中国的发展方向问题时，他们最常说的是“你不了解

中国农村”。这话就像是个大棒子似的，让我无言以对，也没有再讨论下去的基础。所以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好好了解中国农村。因缘际会，从 1991 年开始参加了民间组织“滋根”在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这开启了我认识中国农村的一扇门。博士论文写的就是贫困地区的农村妇女发展，在研究的同时也参与了许多农村扶贫的工作，去了西南、西北的很多农村地区。

时间飞逝，一晃眼就快三十年了，我从当时什么都不懂被戏称“有千万个为什么问题”的年轻人步入老年了，中国农村的发展更是让人惊叹。我第一次踏入的农村是贵州省黔东南的雷山县，这是我博士论文的田野根据地。90 年代我从北京要坐两个晚上的火车一共 33 个小时才能到达黔东南的首府凯里，再搭乘长途车到雷山县城。当时挤得水泄不通的长途车，行李和畜禽等都放在车顶上，摇摇晃晃的近二小时才能到县城，再从县城找拉货的车把我们放到一个连地名都没有，当地人俗称 35 公里处的地方，然后长途跋涉到当时还未通公路的方祥乡。当地人走的快，大约五六个小时就能到，我足足走了 10 个小时，一直走到筋疲力尽。每次从北京去调研一趟大约就要花费三四天的时间才能到目的地。不可思议的是，从 2015 年起，这个“地无三里平、人无三两银”的贵州，已经完成了全省县县通高速的地步。

研究的过程很辛苦吗？

韩：大家都认为我们下乡调研很不容易，其实我自己一直没觉得辛苦，反而乐此不疲，因为每次下乡我都有很多不同的体验与收获。近三十年的农村调研经验，让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原本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道理信念、价值与行为，其实不同地域、不同生活条件、不同民族、性别、阶层的人，有着完全不同的认知和价值观。通过田野，我们可以真实地感知不同的人群，他们如何生活，如何在其所处的环境中顺应自然，寻求因地制宜的生存之道，及衍生出的一种生活态度。雷山县是苗族聚居的山区，苗族先祖因生计选择及远离战争而栖居到这片大山里，面对缺乏土地的山区，他们精心地使用着每一寸土地，层层叠叠开垦的梯田就是他们千百年来智慧与辛勤劳动的结晶。第一次看到这样壮观的景象，我就被这个民族与大自然的对抗所折服。更让我叹为观止的是，水稻田里还养着鲤鱼，这就是所谓的稻田养鱼。稻田养鱼这种古老的共作体系蕴藏着农民的智慧。首先鲤鱼养在稻田里可以吃掉落的稻穗及田里的杂草、叶蝉等害虫，免去了农民拔草的辛劳

或使用农药和除草剂，同时鲤鱼在水田里生活，还可以发挥松动泥土、给水稻提供氧气的作用，促进水稻生长。鲤鱼的排泄物成为施加给稻田的有机肥料，这样农民就无需使用化肥种地了。这种相克相生、种养结合的农耕方式，成就了苗族作为“稻饭鱼羹”的民族。用现在时髦的话，这样的农耕方式不就是所谓的生态农业与循环经济吗？

还有几个画面到现在还是活生生的映在我脑海中：就在贵州的梯田，苗族妇女将身后背着的孩子就放在田埂边时，不到两岁的小孩子就在田埂边上摇摇晃晃地玩耍着，我紧张地盯着那个儿童唯恐他掉到水里头，而当地人却司空见惯，觉得我大惊小怪。小孩不放在田埂旁，难道放到家中无人照顾吗？生活的现实使得这群农村儿童就是在田间地头长大的。这些种种的经历都给了我很大的冲击及思考，也是我一直醉心于农村研究的动力。通过田野调查你真的会发现，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设计的问卷其实很荒谬，只有真的到现场当中，才会发现问卷设计背后不知道的故事，这是做田野调查最大的乐趣。因此一直到现在，我还是非常愿意下乡。社会科学的研究，若只是坐在书斋里制作问卷、撰写访谈大纲，而不是从田野中发现问题，那只是完成个人的学术成就而不能对话与直面社会现象。

二、“研究成果要直面社会现象”

您在书里把自己定位为“农村研究发展的行动者”，您如何定义“行动者”？

韩：行动者的意思是，研究的成果不是单纯为了学术上的兴趣或发表，而是强调研究能反映与解决研究对象的问题。比如说本书（《小而美：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变革故事》）就是基于这样的想法而写的。这本书的目标群体主要是面向教育一线的中小学老师、教育工作者们，特别是农村的教师，希望教师们可以互相借鉴其他小规模学校如何因地制宜提升办学质量，突破困境，探索出可复制、低成本的成功经验。在寻找小而美的农村学校过程中，研究团队也参与了小规模学校教师的成长与培养及推动小规模学校联盟的建设与推广。

在本书调研的过程中，有没有令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韩：一开始到一些农村小规模学校调研时发现学生从原来的几百人萎缩到只有几十个人，学校老师担心哪一天学校也会被撤了。老师的精神面貌都不好，就像打败仗的公鸡泄了气似的，他们对学校的未来没有憧憬与希望。他们在远离城市的农村默默地、孤寂地工作着。随着小规模学校联盟的建立，他们才发现有如此多同行，并慢慢认识了许多全国志同道合的学校。在联盟里面，他们通过线上线下的培训与网络交流，分享自己的教学经验，比如某一位老师做了一堂乡土课程，另外一位教师探索了一门综合实践课，他们都纷纷放到群组中“秀”成果，形成一种良好的竞赛和相互学习借鉴的氛围。联盟与区域共同体的成立，说明了农村教师已经不再是散落在偏僻农村的孤独战斗者，他们运用联盟共同体的力量努力克服城乡资源的巨大差异。他们通过相互学习、分享资源、共享经验、共同成长，成功地将散落在大地的珍珠串连成一股农村教育改革的力量。他们孜孜进取，在各地努力实践探索，将为“翻转”中国农村教育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网络课堂给农村教师和学生打开了一扇通往外界的窗户。一方面，教师受到外界新的理念、方法、教学软件等激发，拥有了教学热情，找到了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学生通过直播课程与来自其他地方的学生竞相展示自己的学习能力，形成一种良性互动。这样，课堂不只局限在农村小校自己班级内的同学，而是可以和来自不同地域学校的学生一起比赛朗诵课文，展示作文、美术作品、手工制品及同唱一首歌。每次直播的镜头转到自己的学校时，这些小规模学校的老师与学生都精神饱满地准备着，以最好的面貌来展现农村小校师生的姿态。这样的新教学组织形式给过去死气沉沉的课堂带来了新的气象。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学生不再孤单地学习，而是可以和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儿童同上一堂课。这样的良性互动鼓舞着他们认真学习。师生们通过网络，以最好的面貌来展现农村小校师生的姿态。

看到这样的变化深深地打动着我们，因此希望这本书里面的优秀案例可以激励更多的乡村老师，让他们认识到小规模学校也可以做到高质量的教育。同时，这些案例学校都不是靠外部资源与人才支持出来的，绝大多数是依赖自身的力量与努力探索出来的，因此他们的可复制性与推广性很高，我们团队都希望这些案例对其他的乡村学校是有启发意义的，并通过各种平台来促成这样的改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把自已定位成行动者。

您在过去的研究提出的一些政策建议，是如何影响到了政策的改变，影响到了-群人福利的提高？

韩：1999-2000 年，我们在北京的城乡结合处的社区进行流动儿童及打工子弟学校的调研，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他们面临的一些困境，譬如说没有学上、学校办学条件简陋、缺乏教师、放学后无人看管等问题。从具体的方面，我们首先组织自己任教学校的大学生到调研的打工子弟学校当志愿者老师，倡导公益组织与基金会对学校办学条件的资助；针对放学后无人看管的现象，2000 年 9 月开始我们就在最早调研的流动人口社区（海淀区的四季青乡柴家坟村）成立了社区学习中心以解决课后无人看管、作业辅导及第二课堂的服务。这种在社区开展对流动儿童群体的服务，今天普遍成为社会组织提供流动儿童的校外活动中的主要模式。从宏观政策上，我们研究发现大量的流动儿童面临无学可上的难题；此外，流动儿童的家长需要花费缴纳比城市儿童更多的费用，但却接受质量参差不齐的教育。因此在 2001 发表的研究报告中的政策建议中我们提出应该让更多流动儿童可以在流入地进入公立学校就读。这份研究报告被北京新华社的记者看到，并让我亲自带他们实际考察了北京的流动儿童学校状况。最后通过新华社的内参渠道，获得当时分管教育的副总理李岚清的批示。其后，我更进一步参与到相关政策的调研中，对促进制定关注流动儿童入学的相关政策起到了一定倡导的作用。这是作为一个研究者最为欣慰的结果。



图为韩嘉玲在暨南大学参加学术研讨会

三、“小规模学校的存在价值不可忽视”

您的新书《小而美：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变革故事》是讲农村小规模学校，是涉及到了农村的教育以及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小规模学校一直都是教育发展问题的末端，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们，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他们的？

韩：因为我一直关注农村教育及教育公平领域的研究，这也是我现在参与的团队——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长期致力之领域之一。本世纪以来，在教育城镇化及撤点并校等大环境下，我国农村教育的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 70 年代的“学校办到家门口”、“村村有小学”的格局发展到当前“城挤、乡宿、村弱”的现状，换言之就是县城里面的大班额学校、乡镇寄宿制学校及村里的小规模学校（包括村小及教学点）的并存状况。这些目前仍然留在村里小规模学校就读的学生，多半是走不了、无法走或出去后被淘汰回来的生源，同时他们多半来自建档立卡的家庭。无论从扶贫的角度来说，这些农村小规模学校都发挥了一定的兜底作用，保住了贫困及困境儿童就学的基本权益。从教育公平的视角，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等待着这类学校的自生自灭，让农村的学生无法就近入学，无法获得有质量的教育。现在主流的观点认为办好寄宿制学校就能解决农村儿童的上学问题，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觉得没有必要保存这类学生人数非常少的学校。我们认为办好农村小规模学校不仅仅是涉及到教育公平以及阻断贫富差异的代际传递问题。从效率的角度来主张或认为用砸钱盖出高大上所盛行的校舍的办学方式就能办好教育的看法，都是忽略从农村发展、乡村文化继承、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等观点来看待农村教育的作用。

虽然教育部在布局调整的意见中提出：小学阶段以走读为主，农村小学 1 至 3 年级学生原则上不寄宿，就近走读上学，小学高年级学生确有需要的可以寄宿。但是我们在调研中却发现仍然有不少三年级以下的儿童寄宿，甚至连幼儿园的孩子都有寄宿的情况。当前普遍的观点认为解决农村学校就是办好寄宿的问题，但是农村学校不是盖好漂亮的校舍就可以解决的，我认为还是要回到办好可以就近入学的村小（多半是小规模学校）。因为在小学的这个阶段，家庭教育与父母的在场还是对儿童成长非常的关键，这绝不是学校教育与老师可以代替的。因此唯有村小 / 小规模学校的存在可以让农村儿童就近入学，这种入学的可及性是教育公平中最基本的教育机会平等的前提条件。



农村学校课堂（网络图片）

此外，村小对于乡村文化的传播与继承发挥着灯塔的作用，对乡村文化的振兴至关重要。我们 90 年代在农村做调查的时候发现，在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大潮下，大量的年轻农村人口外出打工，因此当地人常常形容农村只留下“38，61，99”部队，就是妇女、儿童和老人。然而，随着大量的农村学校的关闭，儿童进城念书，母亲进城陪读，农村中的儿童和妇女也离开农村了，这也是当前农村老龄化的背景之一，也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的空洞化。我们很难想象当农村中没有学校，不再升起国旗，不再有朗朗书声。没有儿童及妇女的村寨，乡村振兴从何振兴？乡土文化如何继承？所以无论是从教育公平的角度还是从扶贫的角度，或是从乡村文化振兴的角度，我们都认为办好村小 / 农村小规模学校的任务非常重要。

您这本书里面讲了十所学校的案例，他们的培养模式可以说是回归了这种教育的本质，但这并不是主流，那么小规模学校如何推广？

韩：这十所学校是案例研究，是一种典型研究方法，通过解剖麻雀的方式，深入挖掘、展现这些小规模学校面对困境如何探索的具体做法。通过十个学校不同探索，也可以说从不同的维度来展现农村小规模学校如何变劣势为优势。一方面小规模学校学生少、资源少，又地处边缘，因为没有人关注，对成绩追求的压力小，反

而给了他们探索的空间。同时农村小规模学校坐落在远离城市的农村，与大自然有着天然连接，地处偏乡也保留着各具特色的地方乡土文化与知识。这使得学校可以将村庄中触手可得源源不绝的资源转化成教育资源，提供发展学生智慧的火花。很多学校开始跃跃一试，并因地制宜地发展出有自己特色的乡土课程，走出了不同的路径。

农村小规模学校当然不是主流，也无法成为主流，我们只想走一条适合农村学校及儿童的教育路径。长期以来，我国的农村学校的城市化倾向，使得他们面临与城市学校在同一轨道赛跑的窘境。同时，追求成绩的应试教育已经走入了死胡同模式，更多的对教育有热情的人已经在探索新教育的可能，农村小规模学校的种种探索也是希望为“翻转”农村教育走出一条发展新路。

让我们更可喜的是，这些案例也让来自大城市的教师在阅读后得到了启发与感动，让我们相信教育创新也可以发端于偏远地区，农村学校的经验一样可以分享给城市的教师。

四、“如何把流动儿童变成人才留在城市？”

您觉得未来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趋势是什么？

韩 目前我正主编另外一本有关流动儿童的书，在书中研究团队积极倡导：在义务教育阶段各级政府应打破现行以户口为依据的户籍管理体制，建立以常住人口 / 现居住人口的户籍制度为依据的入学体制。各级政府不仅应为户籍人口服务，也应将非户籍人口（流动人口）纳入其日常管理与服务范围之内。虽然最近大城市所盛行针对非户籍儿童采取的积分制入学看起来是一种比较科学的衡量标准，可却是一个被人诟病的“拼爹拼妈”入学政策。在积分制入学的要求下，最底层的农民工子女完全被淘汰了。中国很多的问题是很复杂的，比如人口的压力与流动儿童上学的权益，与社会公平之间如何平衡？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把农村学校办得好，做好乡村振兴，是否就没有那么多人到城市工作，这个问题是否

就不会这么尖锐？这个暑假我参与我们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学院（IESR）的广东千村调查，在广东省的农村中，外出打工依然在家庭收入里占很高的比重，如果农业收入还是不能足以维持家庭生计的话，那么人口外出依然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还会继续存在。同时因为流动人口中的留守儿童存量很大，根据全国妇联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2015 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报告，2015 年我国留守儿童有 6877 万，流动儿童有 3426 万，这 6877 万的留守儿童随时可能变成流动儿童。儿童与父母一起共同生活、家庭团聚在国际移民里是第一优先被考虑的重要因素。无论是从人道的考虑或者是从子女发展的角度，儿童跟父母一起生活是儿童的基本权利。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问题未来依旧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挑战。

我觉得流动人口子女教育要从更高的视野去看，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不仅给城市培养了更具活力的新兴力量与未来城市的建设者，同时也为全国输送了一批有现代化视野的人才。对流动儿童教育的辐射与影响，无论从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或从城市对农村帮扶来看，城市都应该发挥及承担更多的支援全国流动儿童教育的责任。这也是现在实施人才规划战略需要关注的问题，我们不是只关注所谓的高精人才的引进，同时更要培养这些从小就生活在城市的流动儿童，而不是因为现在城市人口太多，就通过各种高门槛的入学要求将他们推回老家去。所以我也很高兴 IESR 的老师们很关注这些议题，冯帅章院长从上海到广州一直都关注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并致力于推进政策解决。从理念上我和 IESR 还是比较有契合点的，流动人口各类问题在特大城市的解决还有待努力，所以在这些方面的研究与倡导上我们还要继续推进。

本文首发在自媒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12月18日文章

南方日报专访张思思：HFI-60 将打造房产经济晴雨表



房产经济（网络图片）

12月24日，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产业智库、南方舆情数据研究院和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联合推出的2019年中国上市房企60健康指数(HFI-60)引发业界高度关注。今年6月，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刚刚成立该院第五大研究中心：房地产与区域经济学中心，旨在将房地产研究与区域经济、宏观经济紧密结合，联系政府、企业，积极发挥智库作用助力房地产转型发展，打造中国和东南亚领先的房地产研究智库，以及为业界和政府提供探索行业发展和攻克社会难题的务实的研究中心。作为HFI-60独家学术支持单位，为何首次对外合作就选择了党媒智库？HFI-60的研发背景和应用前景又如何？该院副院长张思思博士日前接受了南方+记者专访。

多维度地衡量房企真实健康状况

南方+：中国上市房企60健康指数(HFI-60)的背景和初衷是什么？

张思思：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深入推进，产业升级和人口流入为房地产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房地产业在我国经济和社会中具有重要地位。“房住不炒”宏观调控下，房地产业保持平稳健康运行，是关乎我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民生的重要议题。在此背景下，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产业智库合作研发的《中国上市房企60健康指数(HFI-60)》，基于客观的多维度的财务数据和舆情分析大数据，从财务状况、内部管理、守法情况、社会评价、公共参与和前景战略等多个角度，综合评估房地产企业健康发展状

况，给房企把脉。希望能够鼓励和促进房地产行业的平稳健康发展，以期房地产业更好地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南方+：国内外类似的指数有哪些？HFI-60与房地产行业其它指数有什么不同？

张思思：国内外围绕企业做指数的产品也有一些，类似于企业健康指数、企业创新指数、房企100强榜单等等。但就我们目前所知，还没有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而设计的房企健康指数产品。此外，房地产行业的各类排行榜的数据失真问题一直饱受业界所诟病，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一些单位迫切需要有一些客观公正的数据产品来了解房地产行业的真实发展状况。党媒智库和高校研究机构的强强联手打造的HFI-60，希望通过真正客观可靠的财报数据和网络舆情分析来解决房地产行业的痛点问题，多方面、多维度地衡量房企真实健康状况。我们选取的财务指标包括企业规模、盈利能力、现金流状况、偿债能力、盈利质量等。此外，我们也利用舆情大数据对房地产企业的公共关系和人事要素等进行分析，以此综合评估房企的健康状况。最后，在指数构建的技术方法上，我们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相对主观赋予权重的方法，主成分分析得到的结果更加客观。

南方+：能否介绍一下HFI-60指数的应用范围以及预期能够实现的目标？

张思思：HFI-60以中国上市房企为研究对象，对纳入监测范围的60家典型企业的财务状况、公共关系等多个核心指标进行考察和评估，构建监测房企健康发展状况的量化综合评估指标体系。在应用方面，针对房地产行业长期缺少权威可靠数据服务的痛点问题，我们希望通过每年两次的专业“体验”，来激励和引导房地产行业长效健康发展，同时为研究制定产业政策和负责行业管理的公共机构、金融机构和政府决策部门提供参考。今后，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监测名单，及时、真实和准确反映行业发展现状，把HFI-60打造成房地产经济的晴雨表。

南方+：作为学术支持单位，你们的研究团队成员大多有过海外留学背景，如何看待国内外行业和企业间的差异？

张思思：为了做好HFI-60的研发工作，我们组建了专门的学术团队，主要成员有在美国、新加坡等国攻读博士及海外工作的经历。我本人曾任职于美国城市研究院和房利美公司，感觉主要的不同有以下几点：首先，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是以出售二手房为主，因此很多房企（commercial real estate firms）主要做经纪人生意（brokerage）或地产管理，而不是拿地建新房。而中国的新房市场占很大比例，因此房企的业务范围、发展模式等与国外有很大不同。其次，国外的房地产行业较为稳定，相关的法律制度也非常完善，纠纷较少。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还在完善过程中，一些新出现的情况和问题没有合适的法律可以遵循。



张思思副教授。受访者供图

房地产业未来有四大潜在增长点

南方+：国家提出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房地产企业应该如何有所作为？

张思思：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之一，是建设成为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这对我国房地产业提出了不小的挑战。以往的房地产业发展模式相对单一，即房企拿地开发销售，但这种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现代消费者的需求。房企的转型升级是必然趋势，可以向配套商、运营商、服务商等角色转变，实现城市运营、生活服务、产业引导的战略转型，这能够给房企带来更稳定和长期的现金流入，也能够更好地服务当下的社会民生需求。



南方+：随着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旧改和城市更新成为房地产行业发展的一片新蓝海。对企业来说，机遇和挑战何在？

张思思：随着城镇化率达到一定水平，增量土地已经达到饱和，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是必然的。城市更新不同于新建项目，需要房企在既有框架下，结合科技、产业迭代、资产运营等，最终实现旧社区的“改头换面”。一般建设周期更长，流程更复杂。城市更新背景下，房企应该注重质量型发展，经营理念需要从单一的拿地开发模式，转变为经营服务模式，在产业和运营模式方面创新，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附加值服务，促进产业升级和区域发展。以租赁市场为例，国内租赁市场存在一定的供需结构失衡，高品质租赁住房供不应求。因此，在人口净流入大的一二线城市，租赁市场逐渐规模化、机构化发展，培育品牌青年公寓和服务型公寓，很可能是房地产市场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南方+：如何看待国内房地产业未来的发展前景？

张思思：未来房地产业有几个潜在增长点。一是新型城镇化深入推进。我国城镇化率仍有大概10%-20%左右的增长空间；二是人口净流入大的都市圈，会依然面临住房刚需和大量租房需求；三是城市更新和部分城市棚改货币化深入推进，会释放不少改善型需求；四是结合城市空间布局规划和产业转型升级，工业地产和商业地产具有发展潜力。随着“房住不炒”的预期稳定，房屋逐渐回归居住属性。从美国等比较成熟的市场来看，房地产商更多是服务管理的角色。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将倒逼国内房企改革，目前行业已经开始出现了标杆性的优质项目。国内房企转型升级，将更好地服务于区域和经济发展，真正惠及于民。

【澎湃新闻】“方言”真的阻碍经济发展吗？

作者：马森（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方言（网络图片）

中国文化虽然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但是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所以内部的区域文化又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各地区之间的方言存在“南腔北调”式的明显差异。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我国各区域经济逐步一体化，人口流动性不断加强，来自不同文化区域的个体之间的经济交往也变得越来越频繁。在这种背景下，方言的差异性对于经济的交流和发展究竟有何影响呢？

“方言”影响收入吗？

随着外来务工人员数量的不断增加，大家是不是会越来越多地在大城市之中遇到无法理解对方所说的“普

通话”的情况呢？方言差异性对于经济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劳动力市场，尤其是服务行业之中。

经济学家利用社会调查数据对于普通话能力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回报进行了一些定量的估计。例如，陈媛媛（2016）通过对于“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以及“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数据分析，发现普通话整体以及单项能力（包括听和说）的提升大概可以提高劳动者收入 3%-4% 左右。这一提升效果主要体现在从事服务行业的跨方言流动人口之中，反映了市场一体化对于劳动力群体语言能力提升的需求。所谓，“学好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同时，普通话能力在南方的作用比在北方更大一些。

虽然普通话能力可以提升劳动力工作的市场范围，但是在本方言区域内，方言能力也可能为劳动者带来一定的优势。例如，Chen et al. (2014) 通过对上海的外来务工人员进行调查发现，来自吴语区能够讲上海话的劳动者在销售相关的服务行业之中具有明显的工资优势。在这种情景之下，相同方言不仅仅降低了交流障碍，而且更多地表现出了一种文化认同感：当地的消费者可能更信任文化背景相似的服务人员。

由于存在着前文所述的跨方言流动的交流障碍以及文化认同感的缺失，经济学研究之中普遍发现我国的劳动力流动存在相当程度的文化障碍：大多数劳动力流动发生在同一汉语方言大区内部（刘毓芸等，2015）。因此文化障碍对于市场一体化形成了一定的阻力。

“方言”会成为影响贸易和投资的因素吗？

由于方言差异性而导致的文化认同感的区别不但影响劳动力市场，也会影响资本市场中资金的流动。Ma (2019) 利用港澳台投资在大陆的地理分布探讨了这一问题。该研究通过对比处于方言区边界附近、地理距离相近的地区，发现粤语区和闽语区与相邻的其他方言区相比，会明显获得更多来自港澳台地区的投资。相同方言导致的文化认同感提升了交易双方的互信程度，进而降低了不确定性，起到了促进投资的作用。

由于历史上行政区划的变革，中国的行政区边界和以方言区为代表的文化区边界（尤其在东南地区）往往会呈现出“犬牙交错”的特征。下图利用中国方言地图集描述了我东南地区各汉语方言的地理分布。我们可以发现，在很多地区，方言区的地理边界通常与行政区的地理边界是不重合的。这个特征使得我们可以通过比较隶属于同一个行政区但是分属于不同方言区的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剔除掉行政区经济政策的影响，得到比较清晰的以方言为代表的文化因素与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地图

Ma (2019) 发现，在方言区边界上的同一个县内，说粤语和闽语的地区比不说粤语和闽语的地区港澳台企业的比重增加 5% 左右。与此同时，其它外资企业的比重在这两种地区之间是没有明显差距的。基于这些证据，我们可以确定是以方言差异为代表的文化因素，而不是其它经济因素导致了港澳台投资比重的差距。

基于港澳台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早期对于经济增长起到的重要促进作用，该研究进一步分析发现，粤语区和闽语区的大陆企业在相当程度上受益于港澳台投资所带来的技术扩散效应，进而提高了自身的生产率水平。通过比较方言区边界周围的大陆企业发现，粤语区和闽语区的大陆企业与非粤语区和闽语区的大陆企业相比，在港澳台企业具有生产优势的行业之中也有着更高的生产率。这一现象说明大陆企业很有可能通过模仿或者学习的途径从港澳台企业获得了提高生产效率的方法。

这一结果一方面说明粤语区和闽语区由于方言优势而实现了更快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说明文化差异对于技术在中国大陆的扩散确实起到了一定程度的阻碍作用。如果不存在方言以及文化差异的话，港澳台投资的技术扩散效应有可能给中国大陆的更多地区带来普遍的好处。

“方言”影响公司管理效率吗？

在公司治理的过程之中,企业家是不是也会考虑“方言”因素呢?戴亦一等(2017)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该研究以2008-2014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方言一致性能够显著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该研究剖析了中国独特的“同乡抱团”现象在公司治理当中起到的作用,并指出这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对于正式经济制度的替代。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此研究也说明当公司管理层人员之间存在文化差异时,有可能带来管理成本的提高,影响企业的管理效率。

“方言”是否阻碍经济发展？

以上的一系列微观研究最终都指向了一个更加宏观的问题:方言差异性是否会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

徐现祥等(2015)对此给出了一个肯定的答案。该研究构建了中国278个地级市的方言多样性指数,并且发现方言多样性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消除方言的多样性可以使人均产出提高多达30%。方言多样性的负面作用主要来自于阻碍知识与技术的传播。

然而潘越等(2017)的研究指出方言的差异性虽然有可能提升交流的成本,但是方言的多样性却有可能带来更多的创新。该研究发现,在文化越多样的地区,民营高科技企业会获得更多的创新产出。不同的文化背景提供了不同的思考方式,为新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由于“方言”差异而导致的文化认同差异在我国市场一体化的过程之中会起到一定程度的阻碍作用。因此,推广普通话,提高共同的文化认同感将有助于降低文化差异性导致的经济成本,促进市场一体化的实现。

然而,我们在推动市场一体化的同时也应当注意保留文化多元化,对于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文化习惯要予以尊重和欣赏。文化多元化将最终成为创新型社会的重要基石。

参考文献:

[1] 陈媛媛, 2016,《普通话能力对中国劳动者收入的影响》,《经济评论》,第6期,第108-122页。

[2] 戴亦一、肖金利、潘越, 2016,《“乡音”能否降低公司代理成本?——基于方言视角的研究》,《经济研究》,第12期,第147-186页。

[3] 刘毓芸、徐现祥、肖泽凯, 2015,《劳动力跨方言流动的倒U型模式》,《经济研究》,第10期,第134-162页。

[4] 潘越、肖金利、戴亦一, 2017,《文化多样性与企业创新:基于方言视角的研究》,《金融研究》,第10期,第146-161页。

[5] 徐现祥、刘毓芸、肖泽凯, 2015,《方言与经济增长》,《经济学报》第2期,第1-32页。

[6] Chen, Zhao, Ming Lu, and Le Xu, 2014, "Returns to Dialect: Identity Exposure through Language in the Chinese Labor Market." China Economic Review, 30, 27-43.

[7] Ma Sen, 2019, "Cultural Linkages and FDI: Identification from Borders of Chinese Dialect Zones." Working Paper.

本文首发在澎湃新闻网以及自媒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11月26日文章

【澎湃新闻】转基因正在敲门，中国要避免被动接受

作者：崔潇濛（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基因组（网络图片）

从孟德尔通过豌豆实验发现遗传定律,到袁隆平通过杂交水稻让全国人民“吃饱饭”,人类在超过千年的历程里不断尝试着用各种方法来改变植物的基因组合,以得到满足人类需要的作物特征。以杂交育种为代表的传统育种方式需要靠大量的“试错”来找到令人满意的结果,而许多人类求之不得的作物性状只在漫长岁月等待后的自然基因突变中才悄然出现。长久以来,人类为了提高这一选育过程的效率而作出了大量的努力。转基因的出现则为人类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世界为什么需要转基因？

1980年以来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世界带来了基因工程(genetic engineering)所涉及的一系列技术,而这些技术现在则被人们泛泛地称为“转基因”。通俗

地讲,转基因技术可以将一个具有特定功能的基因片段从一个生物体中定向转移到另一个生物体中。在农业应用中,相比传统育种,转基因技术这种“定向”的操作方式大大加快了对特定优良性状的选育过程,并降低了传统杂交过程中巨大的不确定性。同时,转基因可以使得一些以杂交方式无法实现的基因组合变为现实,为优良性状育种创造了更大的空间。

在全球范围内,目前已产业化的转基因作物主要的特性是抗虫害和对特定农药免疫。这两类转基因作物特性是对农民需求的直接回应。在许多大宗作物的生产过程中,防治虫害和除草等环节都需要农民做出大量的资源和时间投入。这两类特性的出现大大降低了农民的生产和管理成本。我国在20年前开始推广转基因抗虫棉也是对当时棉铃虫大爆发并造成“棉荒”的一种回应。我

国目前转基因棉种植面积逾 300 万公顷。除棉花外，我国唯一的另一个产业化转基因农产品是番木瓜，但相较于棉花，其种植面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转基因作物的另一大“卖点”是增产，但国内外对此一直存在诸多争论。《纽约时报》在 2016 年的一篇专题文章曾通过对美国和西欧玉米单产变化趋势的简单对比“证明”转基因玉米不会增产。就此，笔者在与著名农业经济学家 Colin Carter 共同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对这一“证据”进行了批驳，并指出一个科学的对比必须基于对气候、政策等诸多其他因素的控制之上。在去年发表的一篇学术文章中，普渡大学和堪萨斯州立大学的研究者利用现代计量方法，在控制了诸多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发现，美国转基因玉米的采用对玉米单产的提升达 17%。这种增产效应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虫害减少和生产环节效率提升。

目前，全球范围内转基因采用率最高的作物是棉花、大豆、玉米、菜籽。其中，转基因棉花产品几乎不会出现在食品行业。转基因大豆、玉米、菜籽则主要以加工制成品、动物饲料等形式支撑着整个食品工业的运转。此外，很大比例的转基因作物并不会直接进入食品工业，而是以各种形式进入能源（如生物燃料）、化工（如玉米化工醇）等其他领域。由于转基因玉米、大豆的特性不是提高口感或营养，他们在生鲜农产品市场上并不具备任何竞争力，也因此不会作为生鲜农产品直接用于食物消费。



转基因棉花（网络图片）

从世界农业发展的角度来讲，转基因作物的普及和推广将是一种必然。一方面，人口增长本身及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意味着全球的食物消费需求会在未来持续上

升。世界银行在 2017 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全球的食物消费需求在未来 15 年内将至少增加 20%。另一方面，耕地资源愈发紧张，食物供给的压力将主要通过提高单位面积的产出来得到缓解。然而，基于著名农业经济学家 Julian Alston 等人的研究发现，传统育种在增加单产上的边际贡献已经变得非常微小。若干年后，转基因对人类而言可能将是“生与死”的选择。

中国的转基因产业化或成被动选择

在食物需求和供给间的矛盾这件事上，中国是世界的缩影。在需求端，我们看到的是粮食需求量持续上涨；在供给端，我们看到的是对 18 亿亩红线严防死守。在粮食自给的方针下，供需间的矛盾似乎越发难以调和。一直以来，国家层面显然对转基因等生物技术的发展十分重视。我国转基因技术的研发在 20 世纪 80 年代便开始起步，如今大面积推广的转基因棉便由我国自主开发并拥有知识产权。

我国针对主粮作物转基因的自主研发也已超过 20 年，但严重的舆情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研发和应用转化的进程。在“反转”声势最浩大的一段时间里，甚至出现过多起人为破坏转基因实验田的事件。目前，我国转基因发展的方针被总结为 16 个字：“确保安全、自主创新、大胆研究、慎重推广”。在此方针下，转基因研发持续推进，但转基因产业化尚无任何时间表。

然而，危机已经迫在眉睫了。与发展方针的美好构想相对的，是现实中越发不可控的转基因“入侵”。近年来，各地每年都有多起非法生产、加工转基因玉米的案件受到通报。一些非官方统计显示，在我国种植的玉米当中，已有很大比例的种子携带了转基因玉米种子的基因信息。

多年来，转基因玉米种子通过多种途径流入我国境内。虽然执法部门对非法贩卖转基因种子的处罚力度并不轻，但转基因玉米非法偷种的现象并未得到有效遏止。转基因种子黑市在近年来迅速发展，在通过各种途径流通的玉米种子中，具有抗虫特性的玉米种子最受农民的青睐，而业内人士指出这些抗虫特性大多来源于国外的转基因玉米种子。对农民而言，是否使用有抗虫特性的玉米种子对其最终的销售利润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我国目前转基因玉米泛滥的问题已十分严重，许多种植转基因玉米的农民甚至并不清楚他们种植了转基因玉米。然而，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可能带来“基因飘散”，使某些特定的基因信息被附近的其他作物所携带，并进而产生负面的环境影响。国外合法种植的转基因作物需要按管理规定在附近设置生物隔离带以防止“基因飘散”的发生，但我国非法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并不会采取此类针对性的措施。这将使非法转基因玉米产生的“基因飘散”问题更为严重，进而使得更多“无辜”的玉米携带了“非法”的基因。玉米产业严峻的形势可能会迫使国家提前转基因玉米的产业化。在这一背景下，充分评估放开转基因玉米的潜在影响将是短期内十分重要的工作。

中国的优势与挑战

转基因作物种子的研发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与时间，这一点与很多新药物的开发十分相似。在一个完全商业化的环境中，这类研发的实现通常依赖于具有垄断性质的企业。企业对垄断利润的追求构成其前期研发投资的激励。然而，种企的垄断能力可能会使农民的利益受损。目前已被拜耳收购的孟山都（Monsanto）是转基因种子研发的领导者，但其在美国的广大农民心中可谓“臭名昭著”，许多农场主对孟山都都在交易中设立的诸多严苛条款十分不满，农场主与孟山都之间的法律纠纷也绵延不绝。

即使抛开垄断企业利用市场力量“压迫”生产者这件事不谈，以私营部门为主导的转基因作物研发方式仍存在诸多问题。由于企业本身的牟利动机，其在研发方向上的选择势必要服务于未来利润的实现。具体而言，企业开发的种子一定是面向其最主要的销售市场，并相对局限于这一市场上的大宗作物。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因地制宜开发的转基因种子将能带来更大的社会福利效应。然而在私营部门主导的研发进程中，这些种子很难出现。

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步以来，我国的转基因技术研发一直由院校和科研机构为主导，研发重点立足于国情和我国农业发展的现实需要。我国转基因抗虫棉的自主研发与应用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看，相比西方以私营部门主导的研发模式，我国以公共部门主导的研发模式将更能符合我国农业发展的需要。同时，从国家的角度出发，通过院校和科研院所研发所形成的自主知识产权也有利于我国未来在转基因作物市场上的国际竞争。这些是我国在转基因农业长期发展中的优势。

然而，就短期而言，如果玉米等产业被迫迅速推动产业化，我们也将面对诸多挑战。从实验室和实验田转向大规模的商业化种植，这一过程中有许多风险点需要消化。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如何区分和对待原先非法的转基因玉米和放开后合法的转基因玉米？这个问题一方面涉及到技术上如何去实现分辨；另一方面，也涉及到对现有法律法规的补充与完善。此外，产业化的实施也必将造成国外转基因种子的进一步流入，以及国内、国外转基因种子的竞争。这个过程中会不会面临知识产权问题的争议？我们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种子又是否能够经得起一个开放市场的检验？

此外，人们通常关心转基因作物的健康风险，却对种植转基因作物潜在的生态环境风险重视不足。然而，在小规模的实验环境下，一些生态环境风险很难被充分度量。除了前面提到的“基因飘散”问题，大面积种植转基因作物还可能会降低区域内的物种多样性，使得当地的生态环境变得更为脆弱。种植转基因作物也需要面对虫害和杂草抗药性增强的潜在威胁。虽然抗药性问题并非转基因作物特有，但具有特定基因的转基因作物往往需要特定农药的配合，这意味着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农民无法轻易通过更换农药来缓解抗药性增强的问题。

虽然转基因技术本身是一个科学问题，转基因的产业化却涉及到各个领域的方方面面。不论从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的大趋势出发，还是从目前国内转基因泛滥的严峻形势出发，与我国玉米等粮食作物转基因产业化有关的研究与讨论都已变得十分迫切。毕竟，留给中国的时间已经不多。

本文首发自澎湃新闻网及自媒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12 月 4 日文章

卢晶亮：中国男足真的落后吗？ 来自经济学文献的证据

作者：卢晶亮（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



中国足球（网络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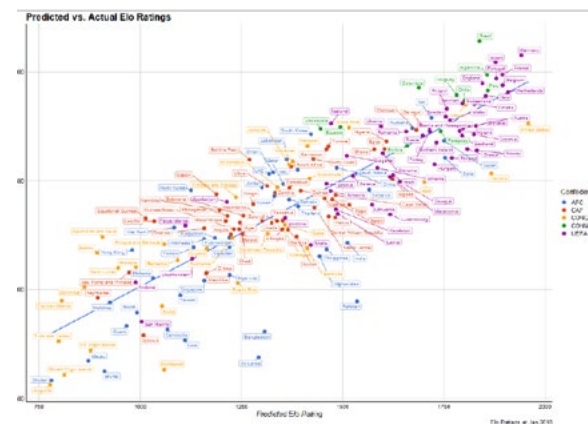
近日，中国女排以 11 战全胜的战绩夺得女排世界杯冠军，这是中国女排历史上第五次以全胜战绩夺取世界三大赛冠军。至此，中国女排共获得 5 次世界杯冠军、3 次奥运会冠军、2 次世锦赛冠军，整整 10 个世界冠军！在国人为女排感到骄傲与自豪的同时，男篮和男足又不免“惨遭调侃”。有网友戏称：“女排把观众打哭，乒乓把对手打哭，男篮被对手打哭，男足一直在家哭……”。前段时间男篮兵败世界杯，被称为“断崖式下滑”，更有网友担心男篮有“国足化”的趋势。可见“最惨”的还是国足，其在国人印象中的战绩和地位一直非常“稳定”。但这也反映出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的受关注程度，国人最期望看到的还是国足崛起。

作为一个老球迷，笔者也曾为国奥 1996 年兵败吉隆坡，国足 1997 年饮恨金州而捶胸顿足。但随着年岁、阅历和知识的增长，现在的我已经可以心平气和地看待和接受中国男足的成绩，不会再加入调侃国足的人群。关于“中国男足屡战屡败的原因是什么？”，“中国足球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诸如此类问题的讨论经久不衰。笔者好奇的是，说中国足球落后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有人会说，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找出 11 个会踢球的人很困难吗？有人会说，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足球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极不相称。有人会说，中国在奥运会金牌榜上屡次位居前三，足球水平却相形见绌。人口众多、经济富裕、称雄奥运的国家一定擅长足球运动吗？很抱歉，答案是 no。

让我们通过各国男足的国际足联世界排名来考察一番。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三个国家，中国男足排名 68，印度 104，美国 21。再看世界上人均 GDP 最高的国家和地区，卡塔尔男足排名 62，中国澳门 184，卢森堡 93。如果看经济总量，除去中美，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男足世界排名为 31。2016 年里约夏季奥运会金牌榜美国和中国位列第 1 和第 3 名，英国排名第 2，而英格兰男足排名世界第 4，这得益于他们在 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上的出色表现（请不要再称他们为“欧洲中国队”）。一些题外话，2004 年雅典奥运会中国以 32 块金牌高居奖牌榜第 2 位，而我更羡慕的是排名 38 位的阿根廷。虽然他们只拿到了 2 块金牌，但分别是男篮金牌和男足金牌。2008 年阿根廷国奥队在北京奥运会上蝉联男足冠军，笔者曾有幸在上海现场目睹了球王梅西的风采。言归正传，读到此处肯定有读者会说，考察一个国家的足球水平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而不能只看某一方面。决定一个国家足球竞技水平的社会经济因素到底是什么呢？一些经济学研究曾经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英国两位学者 Garry Gelade 和 Paul Dobson 在 2007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考察了足球人口、人均 GDP、足球传统、海外效力球员比例、气候特征等六个因素对一个国家男足竞技水平的影响。他们用国际足联排名积分来衡量一个国家男足的竞技水平。足球人口指一个国家经常从事足球运动的人口数，代表了一个国家足球人才库（talent pool）的大小，该数据来源于国际足联对各个成员国所做的调查。理想情况下，一个国家足球队应该由这个国家足球天赋最高的一群人组成，而从事足球运动的人越多，选拔到天赋最高球员的概率越大。人均 GDP 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在足球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入越有保障，而生活水平越高国家的人民选择从事职业足球运动的自由度更大。足球传统用一个国家加入国际足联的时间长短来衡量，加入国际足联时间越长，参加的国际比赛越多，积累的经验就会越丰富。海外效力球员比例指国家队球员中在海外职业联赛中效力的比例。数据显示，2000-2005 年 200 余个国家（地区）代表队的球员中有 40.9% 效力于海外联赛，其中 86.2% 在水平更高的海外联赛中效力。众所周知，在欧洲顶级联赛中效力是每个职业足球运动员的梦想。一国国家队在高水平联赛中效力的球员越多，实力越强。想想每个周末看到“伦敦球王”孙兴慜的精彩表现，中国球迷怎能不眼热。最后，气候因素会影响运动员的竞技水平，这是得到诸多体育运动文献支持的结论。

实证结果表明，上述六大因素都与一国男足竞技水平显著相关，共同解释了各国男足竞技水平差异的 70%。Gelade 在 2018 年利用更新的数据复制了上述研究，结果依然稳健。有趣的是，他利用模型和数据对于各国的男足竞技水平进行了预测，并与实际结果进行了对比。如下图所示，位于回归线上方的观测点表示该国实际竞技水平要高于模型预测水平，位于回归线下方的观测点则相反。巴西、德国、西班牙、法国、阿根廷等世界顶尖强队均位于回归线上方，表明现有模型还不足以解释这些国家为何强大。而中国队几乎就位于回归线上，表明模型预测与实际情况十分接近。回到题目中的问题，中国男足真的落后吗？答案或许是：不，基于中国的经济水平、足球人口等条件，这就是我们该有的水平。一个国家该如何提高足球水平呢？Gelade 的建议是，你很难去改变一个国家的气候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但是可以尝试去扩大足球人才库并让更多的球员去海外锤炼。第一点归根结底在于建立完备的青训系统，让所有有天赋的足球少儿都能够有机会兑现他们的天赋。第二点建立在第一点之上，当真正有天赋的足球人才不断涌现，全球顶级联赛自然会对他们敞开大门。郝海东当年无法转会佩纳罗尔队的悲剧注定不会再上演，眼前最大的“悲剧”是我们只有一个武磊有实力跻身欧洲顶级联赛。



图片来源：Gelade（2018）

著名体育经济学家 Stefan Szymanski 与合作者 Melanie Krause 于今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探讨了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男足竞技水平存在收敛（convergence）现象吗？收敛问题是经济学中的经典议题，由于穷国的资本边际生产力更高并且可以对富国的技术进行模仿，那么穷国的经济增长率应该高于富国，长期来看各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应该存在收敛现象。诸多文献的实证研究结果并不支持这一论断，但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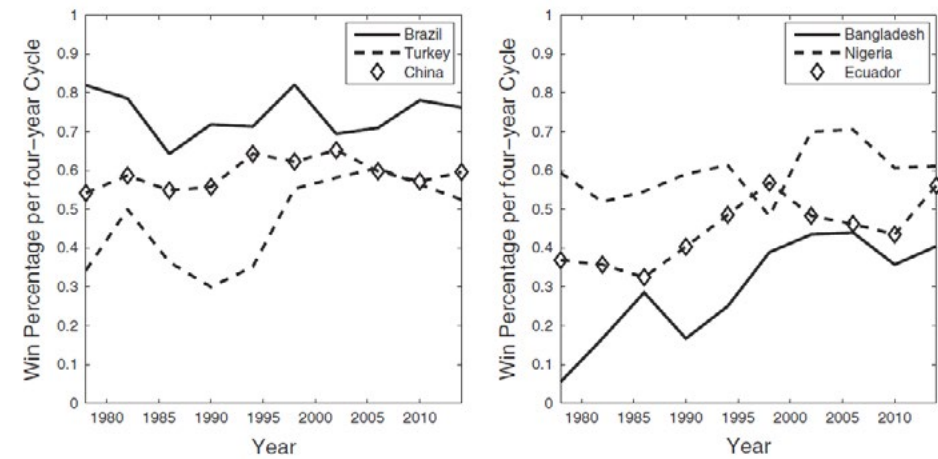
新近的文献却发现各国制造业生产率存在收敛现象。原因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制造业生产的可贸易产品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流通，各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产业链，全球竞争与跨国技术转移促使各国制造业生产率出现趋同现象。两位作者认为，足球作为当今世界最流行的现代服务业，各国间的“技术”转移（球员和教练的全球流动）更加畅通无阻，引进高水平外教以及球员到高水平海外联赛磨炼都会提高国家队的水平，因此各国足球的竞技水平也可能存在趋同现象。

作者利用 1950-2014 年间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代表队之间 25000 多场国际比赛的数据研究发现：（1）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男足竞技水平确实存在收敛现象，落后国家的竞技水平提高更快；（2）但是水平提高最快的是欧洲和南美洲那些曾经的足球“弱国”，而亚洲和非洲的整体竞技水平进步缓慢。（3）某些国家的足球竞技水平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意指不高不低的竞技水平长期以来裹步不前。很遗憾，作者列举的陷入竞技水平“中等收入陷阱”的球队就包括中国队。下图展示了六个国家男足平均胜率的长期变动趋势，足球王国巴西队的胜率长期稳定在 70% 左右，欧洲和南美洲曾经的弱队土耳其队和厄瓜多尔队的平均胜率都有了稳步提高。曾经足球水平最为落后的孟加拉队有了长足进步，平均胜率从不到 10% 提高到 40%。而“非洲雄鹰”尼日利亚和中国队的平均胜率则长期稳定在 50%-60% 之间。1975 年中国队的胜率就有 55% 左右，40 年过去了，我们的胜率还稳定在这个水平。如果这个世界对手都在进步，而你原地踏步，自然也就是退步，中国球迷都应该懂。题外话，左图中的巴西、土耳其和中国 2002 年

世界杯正好分在同一个小组。图中显示中国队的平均胜率还一直高于土耳其队，那是因为中国队的对手基本上是亚洲球队，而土耳其队长期和欧洲列强切磋。至于中国队和土耳其队水平的差距，看过当年比赛的球迷都知道。

Szymanski 认为，欧洲和南美洲的弱队由于身处足球水平最高的大洲，和足球强国在各方面的交流频繁而深入，水平提高更快。想想 2016 年欧洲杯掀翻英格兰队杀入 8 强的冰岛队，其多位国脚效力于英超联赛。对于足球水平非常落后的国家，想要提高水平较为容易；但是对于中等水平国家，尤其是远离世界足球中心的亚洲和非洲球队，想要进一步提高水平则任重道远。2019 年 8 月日本国家队公布世界杯预选赛 23 人大名单，其中 19 人在欧洲俱乐部效力。向世界最高水平学习是提高自身水平的必经之路，日本足球让本国球员的水平得到世界的认可花费了几十年时间，这背后的艰苦奋斗可想而知。Szymanski 认为想要突破竞技水平的“中等收入陷阱”别无他法，唯有深挖足球人口的潜力，青训才是王道。冰岛异军突起靠什么？靠青训。日本从亚洲二流到世界强队靠什么？靠青训。德国足球走出低谷重整雄风靠什么？靠青训。泰国队击败国足靠什么？靠青训。

亲爱的球迷朋友们，吐槽某国脚停球五米远，某国脚射门出边线确实一时痛快。但冷静思考一下，他们已经是现阶段全中国最会踢球的人了，你找不到比他们水平更高的球员了（当然，我对某些国足队员代表俱乐部和国家队比赛时天差地别的认真程度表示不敢苟同）。一个国家的国家队应该是最高竞技水平的代表，应该是高度



个别国家每四年国际比赛平均胜率

图片来源：Krause and Szymanski (2019)

竞争的。国乒队员拿世界冠军比拿国内冠军容易，国足却面临无人可选的尴尬。为什么？因为国乒队员是层层筛选，优中选优，他们确实是全中国最会打乒乓球的人。而我相信以中国的人口基数，足球人才不在少数，但中国的梅西和 C 罗在少儿时代无法兑现他们的天赋，那么也就永远无法兑现他们的天赋了。足球运动员的天赋真是应了中国的那句老话：三岁看老。

有读者会问，你说的要加强青训的道理是老生常谈，大家早就知道。是的，道理我们都懂，但没人去做。诚然，普及青训是一项系统工程：建设免费球场需要土地，需要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普及校园足球需要转变教育理念，需要家长的支持，需要培养大量合格的青训教练；建立各级青少年（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联赛，完备的职业俱乐部梯队需要各级政府的投入和资本力量的加入。以上任何一件都绝非易事，单单依靠中国足协或体育总局肯定办不到，我相信需要更高层次的顶层设计。但这些绝非办不到，只有想不想。中美贸易战让我们明白独立自主需要突破“卡脖子”的核心技术，但在足球世界里从来没有人对我们进行技术封锁。有太多来自足球强国热心人想要帮助中国足球。笔者印象中中国媒体采访日本前足协主席、日本足球百年计划的提出者川渊三郎已经很多次了，中国足协去日本足协考察也已经很多次了。每次老人家都会把日本足球的青训规划和盘托出，毫无保留，那我们学习了吗？

相信每个看过日本高中足球联赛报道的中国球迷都会被强烈震撼，该比赛至今已举办 97 届。每年有超过 4000 所高中代表队参加，最终选出 48 支球队参加全国大赛。赛事由全日本 40 多家电视台转播，由日本最红的球星和演艺明星代言，第 97 届的决赛在埼玉 2002 年世界杯决赛球场举行，这画风是不是如同日漫《足球小将》一般热血？！中田英寿、中村俊辅、本田圭佑、柴崎岳等球星都是从这里走向了世界。火爆的高中联赛背后是从小学开始的完备的各级比赛，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是日本足球崛起的基石。而我们只有海南琼中女足这样让人心酸落泪的故事（不清楚的读者可自行搜索，笔者认为拍成电影票房保底 5 亿）。我想说，足球应该是平民运动，如果每个想踢球的孩子都无球可踢，中国足球永无崛起之日。



第85届日本足球高中联赛应援经理，日本演员新垣结衣（左图）；第96届日本高中足球联赛应援队长，日本球星大迫勇也（右图）

图片来源：新浪体育，谷歌图片

从现在起，中国足球的发展重心应该彻底转移到青少年足球发展上来，尽可能淡化对于国足成绩的追求，这些都是缘木求鱼。对于中国足协 KPI 的考核指标应该是增加了多少青少年足球人口，举办了多少青少年足球比赛，培养了多少青少年足球教练。中长期目标是有多少青少年球员进入海外俱乐部梯队，何时在 U17 亚洲比赛夺冠，何时能够在 U17 世界杯取得好成绩。当达成这些目标，国足成绩提高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我知道这些事情很难，比莫名其妙聘请卡马乔和希丁克，再糊里糊涂解雇他们并赔付大笔违约金要难很多，但这才是该做的事情。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你问我中国人爱足球吗？如果是看足球，我肯定说是。如果是踢足球，我不确定。我坚信成千上万中国少年的足球魂还未熊熊燃烧，等待被点燃之日。

主要参考文献：

Gelade, G. A., & Dobson, P. (2007). Predicting the comparative strengths of national football team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88(1), 244-258.

Krause, M., & Szymanski, S. (2019). Convergence versus the middle-income trap: the case of global soccer. *Applied Economics*, 51(27), 2980-2999.

本文首发在自媒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10月9日文章

【调查手记】子女在，不远游？ ——浙江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流动儿童 保障评估工作手记

作者：余家庆（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留守儿童（网络图片）

2019 年 10 月 14 日至 18 日，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以下简称“IESR”）受民政部委托，前往浙江省开展关于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的第三方评估工作，笔者有幸参与其中。此行经历珍贵难得，也给予笔者对农村留守儿童情况的更深刻的认识与思考。

留守现象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时代景象。一般认为，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建设成绩主要依托于城乡之间工农产品不等价交换所形成的“剪刀差”优势，国家不断从农业部门汲取剩余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中去，从而获得国家发展的原始积累。为了确保这一过程的顺利实施，以 1958 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为标志，城乡居民依托其出身地的不同被划分为农业与非农两种户籍身份，并根据户籍类型获得相应的公共服务待遇。此后直到改革开放时期，人口流动一直被严格管控。

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管制的有序放开，带来了规模空前的流动现象。由于城乡间的巨大发展差异，大量被约束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资源被释放出来，并向城市流动，这一过程形成了具有特色的“近似无限供应”的人口红利现象。与此同时，城市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化改革，把劳动力从既往“无所不包”的单位体制中脱嵌出来，打造了一个廉价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这对于中国而言，是成为“世界工厂”重要基础。

虽然农村人口大量流动进入城市，但城市有限的公共资源依然是依据人口户籍类型进行分配，这是留守现象发生的制度性原因。同时，大部分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存留充满不确定性，也要负担起额外的生活成本。在上述约束下，流动家庭往往把子女安置在家，将养育工作交由父母单方或者老人完成。

“空心化”的农村

流动人口在城市从事劳动生产，但他们的家庭再生产却在农村老家进行。“拆分型”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允许政府通过一个非常低的城市公共产品投入，优先把有限的资源用于实现经济增长的投入再生产中去，如基础设施建设。要“劳动”而非“劳动力”，以及对特定人口有选择性的“驱逐”或“纳入”的经济增长模式，使得大量农村留守子女无法在关键社会化阶段中，获得来自父母双方的充分照料，并由此衍生出种种个人、家庭及社会问题。



“空心化”农村图片来源于网络

近来，IESR 与 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教授合作开展的一项研究（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发现，留守儿童在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测试中的表现均要弱于非留守儿童，尤其是父母双亲均外出务工的留守儿童在相关测试中表现最差（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赫克曼领衔的中国留守儿童调查项目，了解一下！）。赫克曼的研究指出，在劳动力市场中，同等条件下个体的认知与非认知能力能解释 9% 的收入差异（Heckman et al., 2006）。由于孩童阶段是人一生中人力资本投资回报最高的一个时期，而缺乏亲自照护的孩童往往难以获得充足的营养摄入、情感陪伴以及家庭教育，与父母分离的留守经历很可能对农村

留守儿童的发展造成终身潜在的负面影响。目前，赫克曼教授与 IESR 研究团队还在就留守经历对儿童性格、技能及行为偏好的影响展开更进一步的研究。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开展的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调查

但即使如此，外出务工依然是现有农村家庭最优生计选择。如此来看，农村留守无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之路。倘若中国的经济主要增长动力一直源于“世界工厂”角色（即扮演了从原材料与零部件的进口到本土化的生产装配以及全球市场的输出），那么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应很难促进既往增长范式的转型，留守问题也似乎“无刃而解”。

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当前一些因素在促使留守现象发生改变：首先是产业转型下的人口流动新趋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是由于劳动力成本低廉所形成的比较优势，但在东部沿海地区，这一优势近来不断被不断上涨的人力成本所削弱。尤其在全球政治关系不稳定的情况下，跨国资本开始了新一轮的“空间修复”（space fix），并把投资目光转向人口红利优势更为明显的南亚、东南亚及非洲地区。此外，东部沿海地区也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通过环评、最低工资制度等行政手段调整地区产业构成，促使产业升级，把低附加值、高耗能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内陆地区。根据 2018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所显示，当前在中西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继续增加：在中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 6051 万人，增长 2.4%；在西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 5993 万人，增长 4.2%。简而言之，“内陆办厂，本地用工”成为趋势。以全球最大的代工厂富士康为例，近年来就不断向郑州、重庆、西安等地投资设厂。对于这些回流的流动人口而言，他们距离留守在家子女相对更近，在亲子陪伴、子女养育

等等问题上就有了更多的选择。同时内陆城市的生活成本相对更低，流动父母也更有可能是把子女带在身边亲自照料。

其次是人口世代转型下的城市发展路径调整。在既往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家庭现代化（家庭规模趋于缩小）影响下，出生人口数量连年下降，中国地方政府同样面临着新时期驱动经济增长的压力。当人口数量及人口结构的优势下降，人口质量在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则凸显出来。尤其是流动人口“用脚投票”选择新一轮流动时，沿海城市如何“保量提质”成为地方人口战略的首要关注问题。为了吸引更多人口集聚，政府不断推动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提供城市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与普惠化无疑是大势所趋。对流动儿童的公共服务投入，也逐渐被视为对潜在人才培养的人力资本投资，而不是公共支出的财政负担。这一背景下，流动儿童所面临上学难、就医贵等问题逐渐得到改善，父母也更可能把子女从留守农村带入城一同流动。

留守问题背后既是一个时代下国家、社会、家庭发展的“无奈之举”，但也是许多体制性障碍形塑的结果，而后者正是当前要努力破除、根除的对象。尤其当今后留守儿童长大后进入劳动力市场，因制度区隔造成的技能、资本差异，无疑是一种“坏的不平等”（“冯帅章：我国不平等的上升总体而言属于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好的’不平等”），而成长过程中的性格发展、行为规范等等同时受留守经历所影响，并造成许多无法挽回的后果。

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贝弗里·西尔弗所言，政体 / 体系在利润率危机和合法性危机间存在一个彼此的张力（Silver, 2003），这一点决定了留守问题牵涉到中国社会的良性发展与现代化进程。当前，中国政府对关爱留守儿童问题有着巨大的决心，这也是笔者随评估团队在基层所观察到的景象：一个关爱保护留守儿童的保障体系正在初步建成，并体现在留守儿童信息系统登记、农村儿童主任制度、强制报告制度等等之上。当然，这些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落到实处，本质上是一个现代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同步的话题，也正是此行评估组所负责的工作方向。

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挑战依然巨大，但话说回来，正如《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所指出，关爱留守儿童还是最终要靠家庭承担起

监护主体责任。无论多么困难与具有挑战性，我们在入户评估过程中，也发现了不少孩子们接受着外出父母远程关怀、回家务工、定期探视等形式与维度的亲子照料。为此，笔者还是对外出父母抱有一个略带“何不食肉糜”的期待：如果套用古语，那便是——子女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评估组在抽查基层民政部门针对留守儿童的资料以及系统

参考文献

Heckman J J, Stixrud J, Urzua S. The effects of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abilities on labor market outcomes and social behavior[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06, 24(3): 411-482.

Silver B J. Forces of labor: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本文首发在自媒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10月23日文章

暨济一堂

“外来人口市民化”研讨会观点集萃



11月15-16日，由中国人口学会人口迁移流动与城镇化专业委员会主办，我院（IESR）承办的“外来人口市民化”研讨会于暨南大学曾宪梓科学馆406室顺利举办。研讨会上，来自各大高校、研究机构的学者嘉宾各抒己见，讨论外来人口劳动力、医疗、子女入学、住房购房等方面的现状、政策问题。本文将梳理各位专家的精彩观点和政策建议。

王春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城乡两栖现象——城镇化的第三条道路

作者从历史变迁的维度提出了城镇化的第三条道



路——城乡两栖现象，他从两个视角阐述了中国社会从城乡二元到城乡两栖的转向。一是市民化的视角，国家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管理经历了严格控制、消极应对到离

土离乡、积极引导的转变；二是回归视角，在生命周期理论和回乡创业潮的双重影响下，目前中国社会一部分流动人口仍然选择在中老年时期回到农村居住。

由此作者认为，目前中国的城镇化是一种半城镇化的现象，表现为城乡两栖。与完全城市化的现象不同，目前中国由于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导致外来人口完全落户在城市愈发困难，许多外来务工人员选择工作在城市，而最终定居于乡村。与此同时，由产业升级和人口居住变迁所带来的城乡融合现象，为乡村振兴的发展谋求了出路，也为城乡两栖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现实支撑。



卢晶亮（暨南大学）：流动人口与城镇居民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差异

作者主要的研究内容是：流动人口与城镇居民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差异的变动趋势是什么？流动人口融入城镇劳动力市场的主要障碍是什么？基于中国家庭就业调查（China Household Employment Survey）2013、2015、2017 年的数据，作者全面考察了流动人口和城镇居民在劳动参与、失业、就业分布和工资收入等方面的差异及其变化。

研究发现：首先，2013-2017 年流动人口劳动参与概率高于城镇居民，失业概率低于城镇居民；同时，两者劳动参与概率和失业概率的差异在不断缩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趋同；其次，流动人口主要从事自我雇佣以及在私有部门低技能岗位就业，他们在进入国有部门就业方面存在明显障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流动人口与城镇居民的就业分割程度有所降低；最后，2013-2017 年城镇居民与流动人口的工资差距尤其是高收入群体的工资差距有所缩小。



葛国斌（广州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公室）：广州市流动人口卫生健康服务市民化进程中宣传教育痛点、难点问题分析及对策建议

葛国斌首先介绍了广州市流动人口的管理现状，随后主要阐述了广州市流动人口卫生健康服务市民化进程中宣传教育的痛点和难点。他认为，广州市流动人口卫生健康服务宣传教育的痛难点主要表现为：一是流动人口对卫生健康服务知晓率偏低；二是医疗保险的制度隔阂，社会保障受限于户籍、流动人口在广州参保比例不高；三是流动人口卫生健康服务获得状况并不理想；四是市级层面流动人口卫生健康服务内容与基层宣传教育平台，供给与需求缺乏有效对接环节。

葛国斌认为，造成对流动人口卫生健康服务的宣传教育出现问题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进城务工的流动人口缺乏核心竞争力；第二，流动人口年龄以青壮年劳动人群为主要特征；第三，以家族家庭化迁移模式为主的人口流动趋势明显；第四，流动人口从业领域以第三产业就业居多；第五，特殊流动人口群体卫生健康服务需求各异；第六，流动人口卫生健康服务普遍性需求与供给的矛盾。



梁文泉（暨南大学）：中国移民汇款：1995-2015 年

作者认为，中国的市民化进程与户籍制度的变革息息相关，而流动人口在工作过程中常常将部分收入寄给留守家庭，这样的消费行为具有一定经济学的意义。因此作者的研究问题是，户籍如何影响流动人口的汇款行为及其背后的逻辑，以及汇款金额对外来人口、城镇居民和农村人口的福利影响。

作者运用了 RUMIC2008、CFPS2010、CLDS2012-2014 等数据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随着城镇落户门槛越高，有汇款的移民占比会越来越高，户籍获取的难度提高了汇款概率，同时增加了汇款金额，这与家中是否有小孩、是否有土地都有显著性的影响。研究同时表明，城市落户门槛越高，留守儿童和夫妻异地分居的现象更易发生。而从汇款的福利分析来看，汇款金额受到外来人口收入水平的影响，同时汇款金额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本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同时，汇款金额也会对留守儿童的行为，以及家庭长期人力资本产生影响。



韩嘉玲（暨南大学，北京社科院）：融入与挑战：在中国的东南亚跨境妇女

作者介绍东南亚地区跨境妇女在中国的融入现状及面临的挑战。当前，在经济差距为主导的推拉因素作用

下，大量来自越南、缅甸的妇女跨境前往中国境内劳动就业或定居生活，其中，不少东南亚妇女通过婚姻形式留在中国。跨境婚姻最初存在于与边境线接壤的乡村中的相同民族之间，随后则从相同族群内部延伸到跨族群通婚。目前，跨境婚姻女性移民路径有从边境农村向内陆扩展的趋势。通过田野调查发现，东南亚妇女与中国公民的跨境婚姻面临诸如嫁入心理落差、语言沟通困难、劳动就业非正规化等等融入困境，而中国当前的非正规跨境婚姻更是面临无合法身份、缺失婚姻登记、养老需求增大等等困难。这些困境与困难不仅对妇女本身及其家庭而言造成伤害，也对新时期下的涉外社会治理提出了挑战，需要引起各地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注与介入。



刘厚莲（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我国特大城市人口调控时间与优化

作者针对我国城镇化中后期发展阶段基本形成的超大 / 特大城市为发展核心、中小城市为发展圈层的城市群格局，选择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等五大城市作为研究样本，根据五大城市的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得出：特大城市人口基本态势是北京、上海、天津的常住人口增长明显放缓，但广州、深圳人口仍大规模增长；特大城市的人口主要集聚于特大城市的核心城区，边缘城区人口集聚较少，广州、深圳的人口增长主要集中于近郊区。对应地，特大城市对人口调控的实践主要有：成立组织机构，出台人口调控制度；调整城市功能定位，优化城市规划；运用经济、行政等综合手段，优化人口空间布局等，但也面临着诸如对特大城市人口发展规律认识不足、人口调控协同性不高、各方人口调控力量调动不够、政策之间存在冲突等问题。作者提出未来特大城市人口调控的对策应该综合把握未来城镇化、城市、人口、产业、科技创新、社会等领域的发展趋势，系统认识城市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走一条“以城市规划为引领、创新和产业资源布局带动、公共服务均衡布局、提升城市管理治理水平”的道路。



侯佳伟（中央财经大学）：粤港澳大湾区人口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作者首先梳理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发展历程，从 1994 年 10 月广东首次提出“珠三角”概念到 2019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再到 2019 年 11 月 6 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公布 16 项惠港惠澳政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逐步推进，对于人才的需求十分强烈。作者重点比较了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四地人口金字塔结构，发现香港的老龄化和性别结构失衡最严重，除深圳外其余三地也面临老龄化危机。而通过比较四地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生育率、初育年龄、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净迁移量、教育等指标，粤港澳大湾区当前面临人才瓶颈制约，人才水平不高且提高缓慢。作者认为，从人口迁移视角理解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是很关键的一个方面。



李欣（南京农业大学）：住房政策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住房支付能力与产权决策的影响研究

作者首先界定了农村流动人口的含义，对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的原因、问题等方面展开解释，并介绍了我国住房公积金政策。作者采用中国城乡流动人口调查数据（RUMiC）2008-2009 年共计 10210 个家户数据，运

用 Logit 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住房公积金政策对农村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问题，研究发现：第一，住房公积金能够增强外来人口的购房意愿；第二，住房公积金对第二代流动人口买房的促进作用大于第一代流动人口。



张翠玲（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城市流动人口的异质性及生育率

作者展示了一代和新生代城市流动人口的异质性及生育率的差异。研究关注的问题是，流动人口的代际差异是否能够维持城市的生育率？其中，一代流动人口是指 16 岁之后流动的人群；1.5 代流动人口为户口所在地出生，0~15 岁之间随父母流动的人群；二代流动人口则是在流入地出生的人群。

研究发现，不同代际的流动人口在年龄、性别结构、教育程度等方面存在显著异质性。其次，二代流动人口与所在城市的融合度最高。最后，一代和 1.5 代流动人口的生育率均高于城市居民，但二代流动人口的生育率朝城市居民生育率收敛。因此，无法依赖流动人口来维持较高的生育率水平。



刘于琪（香港大学）：向上比较还是向下比较：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幸福感

作者研究了不同参照组对比下，流动人口的幸福感。研究选取了两个参照组，一个参照组为流入地的居民，文中称此为“向上比较”；另一个参照组为流出地（老家）的居民，文中称此为“向下比较”。国际学者较早观察到了流动人口的此类对比现象，并提出了相关理论。Piore（1979）提出 Foundational Theory，该理论认为迁移人口会与留在家乡的人对比；Stark（1991）认为，长期而言，迁移人口会将他们的对比对象转移到迁入地的居民；Guarnizo（1997）和 Vertovec（2004）则支持 Transnationalism Theory，认为迁移人口具有双重参照框架，他们会同时将自己与流入地和流出地对比。作者采用 2014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 CLDS）的数据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第一，我国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与其所在城市的家庭收入和房屋所有权成正比；第二，与流入地居民为参照组的对比具有显著的中介调节效应。这一实证结果支持学者 Stark（1991）的研究，说明我国流动人口会与迁入地的居民对比，这种对比影响了他们的主观幸福感。



汤兆云（华侨大学）：农民工公共医疗服务选择的代际比较——基于 2014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苏浙沪三省数据

农民工的“市民化”过程是工业化、城镇化过程的重要目的。既往研究表明，农民工总体健康水平呈现下降趋势，其中由个人和社会因素所致。而《2016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指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在不断增加。问题在于，不同代际间农民工在公共医疗服务选择上是否存在异质性？通过 2014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苏浙沪三省数据，作者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参与医保类型、生病住院级别、最后一次住院医疗费用保险情况、没有报销住院医疗费原因等等公共医疗服务选择上存在一定的异质性，这背后与其性别、年龄、就业类型等个人因素有关。但总体来说，两代农民工在公共医疗服务选择上依然表现出同质性，没有发生显著的代际差异。和第一代农民工一样，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依然十分缓慢艰难，为此政府应进一步做好相关政策的顶层设计工作。



冯志坚（衡阳师范学院）：市场分割、地区差异与农民工创业收入效应

农民工创业选择与收入问题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但既有文献没有从市场分割层面分析农民工创业选择及

收入效应，忽视了地区间劳动市场的正规化程度差异对农民工创新创业的影响。作者以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识别划分农民工面临的市场分割，并通过詹姆斯·赫克曼的两步法纠正创业样本选择偏差。通过 2016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作者考察了机会型创业（雇主）与生存型创业（自营劳动者）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机会型创业能大幅度提高正规就业农民工收入水平，而农民工创业选择存在显著的负选择偏差，能力弱的农民工更倾向于生存型创业。当前，农民工就业依然面临严重的市场分割问题，为此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创业不仅能扩大就业，还能提高收入水平，缓解收入不平等。



王海宁（中山大学）：同伴效应：农村留守儿童的外部性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农村留守儿童十年间的规模增加了 1.5 倍。现有研究关注了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教育、健康等因素的影响，但尚未有学者考察中国农村地区留守儿童教育外部性问题，即留守儿童对其同伴教育产生的影响。通过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并采用一系列策略处理同伴效应中的内生性问题，作者考察了农村地区初中阶段留守儿童同伴效应对其同班同学语数英成绩的影响，以及同伴效应的异质性。研究发现，同伴效应在学科间存在差异，留守儿童的教育溢出效应显著降低了学生的语言（语文、英语）成绩；同时，低（高）能力群体对其同伴的学习成绩具有显著的负（正）向影响。与同伴的外生背景因素（情境效应）相比，留守儿童同伴效应主要来自于同伴自身能力或能力所致的影响（内生效应）。为此，作者建议深化改革户籍制度和以户籍为基础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制定相关的教育政策消除负外部性。



杜志威（广州地理研究所）：快速城镇化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阶段与行为特征——基于广东省东莞市的调查

市民化实则是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中获取并享有户籍市民各项基本福利和社会保障、融入城市文化与生活方式的过程，现有研究对市民化过程的具体时间节点无明确界定。问题在于，能否通过人口结构与行为特征来判断不同市民化阶段的准确时间节点？作者以外来人口占比超过八成的东莞为研究案例，通过由东莞市提供的新莞人样本登记数据以及抽样调查数据发现，农业转移人口在莞年数呈现两个明显的时间节点（居住或工作满 3 年和满 7 年），并以此作为正在市民化（3~7 年）与稳定市民化（7 年以上）两个阶段的区分。不同市民化阶段的外来人口结构与社会特征具有差异，例如稳定市民化阶段的外来人口更倾向于夫妻同来、子女随迁。外来人口市民化的重要目的是为了便于子女本地就学。为此，作者建议优先推进长时间居住、居家迁移的外来人口市民化进程。同时，推动教育等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与居住年限挂钩的公共服务分配策略。

（文字整理：余家庆 张亚楠 谢慧如 罗非）

本文首发在自媒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11 月 21 日文章

贺丹：关注人工智能对我国劳动就业的多重影响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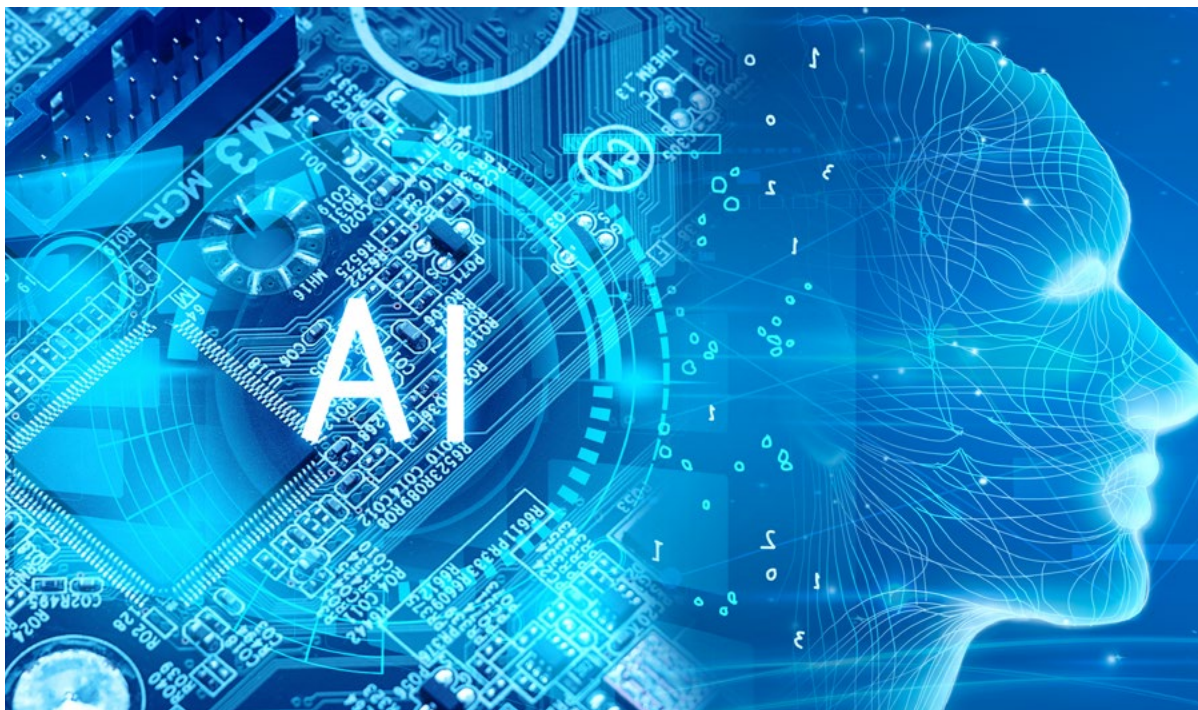
2019 年 12 月 10 日，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研究员来我院作了题为“人工智能对劳动就业的影响”的报告。

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技术，人工智能将对人类经济社会带来深刻的影响。报告伊始，贺丹主任从人工智能是什么、人工智能发展的意义、人工智能发展所处阶段以及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所处国际地位介绍了对当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认识。贺丹主任表示，人工智能是广泛赋能的技术集合，目前我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处于技术跃迁的前夜，经济、法律和政治因素将延缓人工智能发展的进程，为此加强对相关领域的研判非常必要。

贺丹主任表示，首先要在一个宏观的人口经济背景下认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从人口经济宏观背景来看，我国当前面临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双下降趋势。当前我国处于老龄化、低生育率的长期性趋势，人口结构性

矛盾突出，这就带来了劳动力供给不断下降的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16-59 岁劳动人口不断下降；（2）劳动参与率下降；（3）劳动成本上升、社会福利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分别推动了劳动力价格上升。此外，从劳动力需求方面来看，以下因素也导致了劳动力需求侧的下降：首先是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下降；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从既往的劳动密集型模式转向资本密集与技术密集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并带来了资本、技术对劳动的替代问题；此外，国家也加强了经济发展动能转换的政策引导。

为此，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发展将对人类产生深刻的影响。问题在于，人工智能发展将对我们的经济带来哪些方面的改变？贺丹主任从生产的资源聚合方式、生产组织方式以及劳动就业方式三方面进行了阐释。首先是，借助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机器换人”发展，能促进劳动力市场供需平衡，减少当前我国就业



人工智能（网络图片）

总量压力；其次，借助自动化生产对高危、繁重工作的取代，人工智能间接加强了对劳动者的就业保护，将劳动者从繁重、高危险的工种中解放出来；再者，人工智能带来的资源聚合与生产重组能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并缩短劳动时间，从而增加劳动者收入；最后，自动化生产的趋势也能减轻劳动强度，使劳动者有更多闲暇时间去增加消费。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对当前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带来的挑战。

一是由于人工智能应用对劳动力技能提出了新的需求，同时也可能会带来就业的替代效应，由此加剧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使得劳动力市场存在“招工难，就业难”并存局面；二是人工智能发展带来新就业形态，对目前基于正规就业的劳动统计监测管理带来巨大挑战，例如平台经济下的灵活就业，以及网络上的新型创业活动或非正规就业“多点交叉”，面临劳动法规监管难等问题；三是人工智能可能引发一系列伦理问题，例如人机协同的责任边界，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等等；四是人工智能所产生的就业影响，进一步将深刻影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问题。

机遇与挑战并存，贺丹主任对人工智能发展的影响也做出了相应的判断。总体而言，人工智能发展对劳动就业影响是渐近的且温和的；其次对劳动就业结构的影响是系统而全面的；再者对不同区域、产业、行业、企业、人群将带来不平衡的影响；最后，我们不能忽视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效应。面临这些情况，贺丹主任认为，鉴于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未来更是将加速而至，深刻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并对劳动力总量、就业结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体系逐步产生重要影响。为此我们应未雨绸缪，在就业政策、人力资源、服务保障、监测预警等方面，主动顺应人工智能发展趋势，满足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就业需求，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协同发展。

文字整理：余家庆

本文首发在自媒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12月19日文章

香港中文大学宋铮教授谈 中国企业集团的形成



香港中文大学宋铮教授

2019年12月23日，香港中文大学宋铮教授作客我院“暨南论道”公开系列讲座，分享了题为“Conglomerate Formation in China”的报告。此次讲座，宋铮教授主要介绍了他和合作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及模型构建方法。宋铮教授指出中国经济的一个有趣现象：中国的市场制度并不完善，但私营经济却能够迅速发展。他和合作者的最新研究，旨在尝试为该问题提供一个合理解释。

开篇入正题，宋铮教授首先讲解了研究所采用的数据和方法。他们的研究对象为中国本土的企业及企业所有者。数据来源于工商局，涵盖我国1700万家企业和160万个企业所有者的信息，包括企业注册日期、注册资本、股东信息、股权比例等等，并将他们的信息与国家统计局工业调查数据进行匹配。

研究方法上，他们构建了企业所有者的渗透网络（penetrated network）。在他们的研究中，只有拥有超过10%股权的股东被识别为企业所有者。宋铮教授与合作者将这些企业的股权关系联系起来，构建一个企业所有者网络图（owner network），该图可以反映企业的规模、融资成本，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联系的强弱。

研究结果发现，中国企业集团的形成（Conglomerate Formation）充当了非正式的资源分配角色（informal resources allocation institution），减轻了我国资源配置低效的问题，使得私营经济得到发展。

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

蓄势奋进，绵竹项目再起航



预调查小队在金花小学合照留念

2019 年 10 月 20 日，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执行组派出十人组成的先锋小分队，前往四川绵竹的顶新学校、金花学校、紫岩小学开展预调查。本次预调查主要是检验修改后的问卷的效度，测试新增小游戏模块的运行，以及发掘执行方案中可优化的细节。

抵达绵竹后，小分队一下子就被空气中不同于广州的凉意给沁醒，入目的行道树枝头已然褪去了深绿，银杏正在悄悄换上了黄衣。小分队稍作休整便立马投入到筹备工作中，干起活来热火朝天。

不是第一次来绵竹，却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凉露洗秋空”。下过秋雨之后，冷浸小窗，小分队为了抵御秋雨寒，只好穿上自己最厚的衣服，吃下最红的辣椒，并在入校调查过程中，多巡场，认真讲解问卷填答，务求让自己忙起来，让身体暖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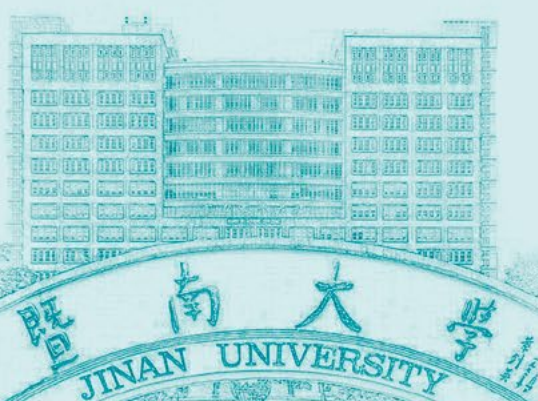
绵竹项目在 2018 年的数据和执行经验基础上，2019 年再次根据社会民情和研究需求等因素修改问卷，并紧跟现代化、信息化建设的步伐，在监护人场次中改进调查方式，推行问卷调查无纸化、电子化，让调查更高效、更环保，让信息数据更安全。学生场次中，今年的调查将新增小游戏模块以测试调查对象之一——学生的风险偏好，并通过答题卡填涂来回收数据，降低问卷遗失、数据丢失的风险。

项目的种种改进，意味着项目正在一步一步地发展和完善，也意味着小分队在这次预调查中的工作并不轻松。为了调整好执行方案和说明措辞，捋顺调查流程，小分队需要严格把控调查时间，仔细记录调查对象的疑问、反应和反馈，每天结束调查后开会讨论；为了及时应对和解决游戏的 bug，优化监护人问卷细节，小分队特意带上了 IT 技术人员，有问题当场处理；为了让调查对象更好地完成新增题目，小分队需要耐心引导，尽可能地

数据 调查

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

“社会调查与应用”系列讲座



举例说明，让调查问题通俗易懂……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实地调查更高效，数据质量更优越。数据的真实可靠，我们愿意一步一步地打磨出来。

预调查之路既有小坎坷，亦有甘如饴。监护人问卷电子化后，家长们在接受调查时纷纷表示，改进之后调查更加便捷和省时，对于信息泄露的担心减少了；看到了项目的改进，希望项目一年接一年地做下去，收集到的数据能够真的为绵竹的孩子作贡献……

学生场次中，孩子们在看到平板之后欢呼雀跃，对于调查的积极性瞬时提升了不少，知道采用答题卡填涂后更加认真严谨地对待调查问卷，课间除了会跟其他班的孩子们炫耀平板之外，还会来到讲台偷偷地跟小分队的成员表达自己的关心和游戏的改进意见。

调查中家长的理解和支持、孩子们的关心和乖巧、校方联络人的热情接待、班主任的热心帮助……都让我们心中暖意融融。调查不能走过场，有所为，有所得。这趟旅程，这次预调查，顺利落幕，但绵竹项目实地执行正厉兵秣马，整装待发！



监护人扫码完成电子问卷

绵竹培训：脚踏实地，为调查做好准备

为规范调查工作，推进项目顺利开展，11月9日，为期两天的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以下简称“绵竹项目”）调查培训正式开始，约70名通过面试的四川高校学子齐聚成都和绵竹，参加了绵竹项目实地调查培训。

培训会主讲人通过一系列的视频带领同学们了解了暨南大学，了解了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了解了绵竹项目的起始与发展历程。随后，主讲人根据材料依次给同学们介绍项目组人员的组成和执行流程，分清调查员在即将开展的调查中扮演什么角色和需要承担的责任。

在学生场次问卷讲解中，主讲人仔细讲解问卷内容和填写的规范和要求，并引导调查员们进行平板模拟操作。同学们将自己代入受访者的角色进行体验，尝试根据自己的情况模拟填写问卷。在这个过程中，同学们纷纷表示新奇好玩，还体验到受访者将会面对的问题，这样更加认真地学习问卷内容和讲解技巧。



主讲人介绍项目背景

下午，主讲人针对同学提出的问题答疑，并重点强调和讲解说明，同学们用自己带的小本本认真地记录问卷填写和检查重点，学而知之，那一双双迷茫的双眼逐渐澄澈而坚定。在简单布置考核小作业后，培训进入试讲环节。

同学们积极主动举手上台，以六年级调查流程为例进行试讲，有的表达流利，落落大方，有的要点讲解齐全，气场强大。主讲老师听后表扬了同学们的认真学习和快速成长，并针对试讲给出相应的改进意见。在问卷调查模拟中大家甚是真情实感地进行角色扮演和情景代入，其中我们的老访员袁航根据自己的调查经验，化身熊孩子，不断提问挑战主讲人花芯老师，师生在一问一答中让新访员更多面、深刻地了解调查现场情况。



上台试讲的同学

监护人问卷讲解和分组模拟中，同学们面对着巨大的信息量、紧凑的节奏、细分的规则，感觉像是进入了暴风圈。主讲老师见状便通过讲述以往调查中的糊涂例子，带动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迅速回升，风趣幽默的语言引得笑声阵阵。



主讲人提问同学

10日，两地的培训仍继续开展，并提升难度，进行规范流程模拟，深化培训，务求让同学们熟悉问卷，熟悉流程，补短板，学到位。

当日下午，成都和绵竹两队顺利会师。

两队通过进行破冰游戏建立起“革命友谊”。队伍集结完毕，回到教室，大家按照安排，开始整理问卷和物资。每个人依次排队，拿袋子、装问卷，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实地入校调查“战役”即将打响，经历过培训的同学们已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定能学以致用。



2019年绵竹项目调查员合照

蓄势奋进，绵竹项目再起航



调查员帮学生答疑解惑

11月11日起，暨南大学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以下简称“绵竹项目”）2019年追踪调查正式进入实地执行阶段。调查员分队前往绵竹的小学开展入校问卷调查工作。

学生场次：群攻与交锋

上午，调查员会被分成四人小队，进班开始学生场次的问卷调查。直到真正跨进五六年级的课时，调查员才真正地认识到，“给30个小学生做调查讲解”是个怎么样的挑战。

喧闹的课堂中，调查员尝试模仿班主任老师的姿态，给学生们强调纪律；此起彼伏的提问中，调查员尝试着记住哪个同学刚刚举手问了问题；三场问卷调查中，调查员尝试用通俗浅白的语言让同学们了解问卷填写要求；风险偏好的测试中，调查员尝试着让同学们因为平板电脑而失去的理智和克制回归……

带孩子的苦真的是不尝不知道，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把访问员给折腾累了，这种“交锋”每天都在上演，而我们的调查员也渐渐成长了，在群攻之下依然是通力合作、循序渐进地把控调查进度，从容而自信。

监护人场次：方言鏖战与陌生的感谢

“奶奶您叫什么名字？”“哈？你说啥子？”“我说……”下午监护人场次中整个食堂都充斥着调查员们访问的声音。虽然调查员们本身精通四川话，但是架不住受访者们多少带点口音，所以调查中的沟通有时候需要调查员们调整自己的频道去适应。有时刚开始调整不过来的话，就会看到两个四川人那里互相问“你说的啥子呢，能不能用四川话好好说……”

家长们如同潮水一样一波又一波地涌进调查场地，调查员们便一轮接着一轮地进行讲解和说明，既是车轮战又是持久战。但完成了问卷之后调查员们又会原地复活，开心地比拼着谁更好更多地完成监护人问卷。

“咳咳咳”当调查访问让嗓子冒烟了，项目组老师以为调查员们不能坚持下去的时候，他们都会默默要上一杯水，猛灌一口或赶紧补充润喉糖后又回到座位继续下一份监护人问卷的访问。

“还以为你们都做不下去了。”

“当我听到那些原本暴躁不想做调查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在完成调查之后说‘真的很感谢你们从那么远的地方来看看绵竹的孩子们，谢谢你们，希望你们工作顺利’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心很难不柔软，也不敢不坚持下去。我想要对得起这声‘谢谢’。”

绵竹项目第一周数据收集工作在调查员的努力下顺利完成！因为有你们，未来将会变得更好！



主讲人为受访学生进行调查讲解



调查员一对一地给家长说明问卷填写

有志者，事竟成——追踪调查实地执行阶段圆满结束

11月21日，“铃铃铃”学校放学铃声准时响起，随着食堂里最后一名受访家长填完了问卷，暨南大学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LSCD，以下简称绵竹项目）2019年追踪调查实地执行阶段圆满结束。11月11日-21日，9天时间，16名项目组成员和逾70名调查员一同参与18所学校的访问和调查，沉甸甸的问卷结出的是一颗颗真实有效的数据果实。

调查奋斗史由你我来共同书写

从面试相识到培训相知，我们青涩而矜持。从第一天入校到最后一份问卷的完成，我们相助相伴。



调查员为受访学生解疑答惑



调查的过程中见过的童真笑颜

绵竹项目实地执行的过程，我们曾一起见过朝晖未出，一起伴着落日返程。从学生场次到监护人场次，平均每天奋战 8 小时，保温杯里的养生茶是我们调查奋斗的续航利器。

一份份问卷是战绩，一份份小礼物是心意，意外收获的灿烂笑容和暖心感谢，让我们有动力坚持了调查全过程。

调查结束之后不想说“再见”

绵竹项目这艘“船”让来自天南地北的我们相聚在一起，从初识的拘谨到后期默契十足地分工合作，友谊之花在我们彼此之间渐渐绽放。

但是天下无不散之筵席，最后的最后，项目组依然还是和各位调查互道“珍重”和“再见”。那时最多的是不舍，是脱下小黄衣后的再次拥抱，是抓紧最后机会合影，是轻声留言，是一直不停地挥手送别。

“老师，明年我们绵竹再见！”



离别之前项目组老师和调查员最后相拥一次

“老师，明年千村项目我也想报名参加！”

“老师，要多回来四川看看我们！”

……

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2019 因为绵竹项目而相遇的我们定会在茫茫人海中重逢。

山高路远，我们下一年见！

“社会调查与应用”系列讲座

北京大学孙妍：追踪调查的理论及实践



孙妍博士

2019 年 11 月 25 日下午，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社会调查与应用”系列讲座开讲！

第一期讲座的主讲人是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孙妍博士，她的讲座题目是“追踪调查的理论及实践——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经验分享”。

孙妍博士就职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任 CFPS 项目组调查主管，主要负责调查中心问卷设计、问卷计算机化设计、访问管理系统设计及调查过程质量监督。

孙妍博士具有 13 年从事社会调查项目执行的经验，作为课题组核心成员参与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中国南方集体林区林权制度改革调查、退耕还林工程社会经济效果评估等 9 项大型社会调查项目。



同学们认真听讲并做笔记

云南大学陈瑛：海外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现状、风险和问题



陈瑛教授

2019年12月23日下午，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社会调查与应用”系列讲座第二期如期举办。本期主讲人云南大学陈瑛教授分享了题为“海外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现状、风险与问题”的报告，并介绍了“海外中资企业与员工调查”（Overseas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Employees Survey, OCEES）数据库。

陈瑛，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数字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海外中资企业与员工调查”（OCEES）数据库技术负责人。陈瑛教授主要研究少数民族就业问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等，在《经济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等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主持教育部、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级课题。

讲座中，陈瑛结合实际调研经历，简要地讲述了海外中资企业与员工调查的执行条件、项目进展、数据特色、预期成果等方面内容。调查中如企业问卷中海外中

资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工会及劳动争议、海外投资风险与中国形象议题，员工问卷中的企业员工的社会交往、大国影响力等特色内容的讲述让在座师生兴致盎然，听得津津有味。陈瑛的分享中提及，调查执行过程中，地域文化差异、风俗习惯、当地政治情况带来了各种挑战，这让大家深切感受到跨国调研的不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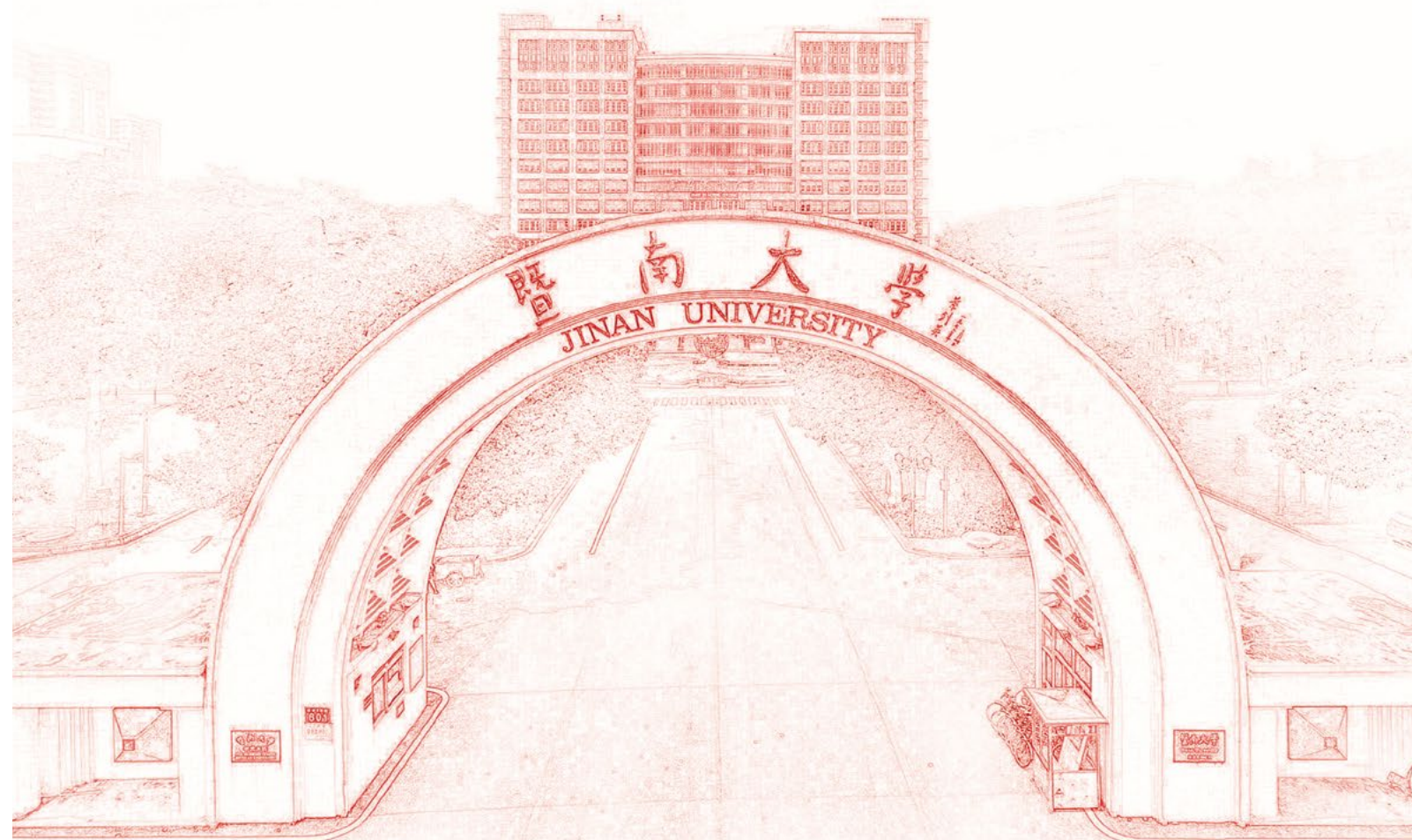
讲座后半段，陈瑛重点阐述“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海外中资企业的基本现状、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存在的风险和问题以及研究初步结论。在场师生就数据收集情况和报告内容积极提问，气氛活跃。

讲座现场座无虚席，主讲人和在场师生互动良好，相关问题的踊跃讨论增进了师生对海外中资企业现状和发展的了解。

人物专访

名师零距离

IISR人物



名师零距离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Bryan Graham 教授：现在是网络计量经济学的黄金时期

人物名片



Bryan Graham，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系教授，担任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的联合编辑。研究领域包括网络建构、同群效应识别、面板数据以及缺失数据问题，Graham 教授是网络计量经济学结构性模型方法的主要专家和该领域的开拓者之一。他的研究成果发表于 Econometrica、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等国际顶级期刊。他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曾获得富布赖特奖学金，罗德奖学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研究生奖学金，哈佛大学的公正、福利和经济学项目奖学金 (Harvard University Program on Justice, Welfare and Economics Fellowship)，以及麦克阿瑟研究网的社会互动与经济不平等奖学金 (MacArthur Network on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Fellowship)。

12月9日-13日，Bryan Graham 教授来到我院计量经济学高阶训练营授课。他风度翩翩、风趣幽默，在训练营中圈粉无数。作为网络计量经济学顶级学者的 Bryan Graham 如何看待这一领域研究现状？他对这一领域的学者又有何建议？

“现在是网络计量经济学的黄金时期”

在研究生时期，Bryan Graham 就对网络经济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他看来，网络计量经济学是经济学中一门重要且有趣的课题，人类从事的许多经济学活动都离不开网络。比如，个体层面上，求职者与他人的友谊会让他在求职过程中更为顺利；在更为宏观的层面，公

司之间的复杂的供应链关系和贸易往来，以及不同组织之间的技术学习与合作，都得益于网络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网络计量经济学发展的限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研究并没有取得突破。直到大约六年前，Bryan Graham 才正式开始网络经济学领域的研究。

网络经济学理论源于博弈论，发展至今只有二十年的历史，对于经济学者而言，这是个具有挑战性的领域。Bryan Graham 承认，把网络经济学理论与计量经济学相结合是项高要求的工作，但这正是进行网络计量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当前许多文章会构造许多看似前沿和有突破性的模型，但在实证方面却选择了简约式或固定效应的线性回归，他认为这些文章的作者要在模型和数据



Bryan Graham教授在与计量经济学高阶训练营学员交流

分析上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他目前所进行的图论数据结构方法的研究，在网络经济学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他介绍到，以投入产出分析或雇主和雇员匹配为例，许多经济学者感兴趣和应用到的数据都具有典型的图论结构。他希望他所进行的网络计量的方法研究会给研究者提供更多的选择。

现如今，网络计量经济研究是经济学研究的前沿，众多经济学者和经济学博士生都想进入这个新兴领域进行探索，但不少人在可能会遇到挑战或挫折面前犹豫。Bryan Graham 认为，现在是进行网络计量经济学学习的黄金时期。对网络计量经济学研究的新手而言，已有的文献已足够让他们熟悉这个领域的状况，计量经济学的前辈们近些年来所开创的研究道路可提供借鉴，具有充分的参考价值。除此之外，可应用的数据也不断丰富。以他的学生的关于美国航线、信用卡积分和旅馆住宿的研究为例，他表示，在现实经济活动中，有许多具有研究价值的潜在课题。他鼓励实证经济学者们去探索和寻找有着良好图论结构的数据，并试着用模型捕捉其中的结构特征。而对于理论导向的经济学者，他指出，许多研究内容都可以应用在网络经济学主题下，虽然这其中会遇到许多困难，但他对此抱有乐观的预期。

“不需要在意自己的出身”

Bryan Graham 对准备进行网络计量研究的经济学者传递的其中一个重要讯息是，不需要在意自己的“出身”——进行网络计量经济学研究不拘束于原来的经济学背景。Bryan Graham 说，他博士期间的导师 Gary Chamberlain 教授致力于面板数据的研究。对 Bryan Graham 自身而言，面板数据根植于他的经济学学习过程。所以，他在网络计量经济学研究中自然而然地会使用到许多面板数据的内容。但许多其它研究者会从其它角度出发讨论网络计量经济学，比如伦敦大学学院的 Aureo de Paula 教授就主要从博弈计量的角度开展研究。他鼓励经济学者们积极探索网络计量经济学，多样化的“出身”会给网络计量主题下的问题提供多种研究思路，丰富这门学科的发展道路。

提到网络计量经济学研究未来发展过程中会遇到的挑战，Bryan Graham 表示对于一个年轻的领域，无论是理论、建模或是计算等方面都会遇到不小的挑战。在理论和建模方面，网络计量经济学研究中所遇到的难点是前所未有的，需要研究者们努力攻克。网络的复杂性使得计算也颇具挑战，但他指出计算机科学的发展降低了这方面的难度。经济学者可以积极寻求各领域的跨学科合作，如与统计学家、计算机科学家的合作，可以共同解决网络计量研究中的计算难点。

“要提醒自己，学习机会是宝贵的”

浏览 Bryan Graham 的简历，所有学生都会赞叹他在求学过程中的杰出表现——他获得过最优等拉丁文学学位、福布莱特奖学金以及罗德奖学金。提到这些荣誉，Bryan Graham 教授谦虚地表示运气是一部分原因。Bryan Graham 教授成长于美国缅因州的乡村，在上大学以前不能接触到好的教育资源，大学校园给他带来了学习和体验的机会。在大学里，他努力学习知识，体验大学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尽情享受知识所带来的快乐。相比于现在的学生，Bryan Graham 在他的学生时代并不具有如此强烈的竞争意识，他持续拼搏的动力来源于他对学习的热爱。他说，他热爱学习，就如同顶尖职业运动员热爱他们的体育项目一般，热爱让他们能不断进步并取得成绩。他认为现如今有一部分学生在沉重的课业负担下失去了对学习知识的享受，对此他的建议是“要提醒自己，学习的机会是宝贵的，永远不要忘记享受和体验知识带来的乐趣”。

作为经济学者，Bryan Graham 承认经济学研究中存在许多困难。他的做法是，首先暂时放下目前难以进行的项目，其次是在有价值的项目中，享受解决困难的过程。在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失败和沮丧，但只要体验到了战胜困难的喜悦，就会更有动力迎接下一次的挑战。

除了是优秀的经济学家，Bryan Graham 还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和出色的跑者。在家庭生活里，他积极参与孩子的成长，他会与孩子一起创造有趣的家庭活动；而在跑场上，他坚持跑步训练并参加全国范围的跑步竞赛。他说，作为经济学者，他能平衡工作和生活的关键在于，他会仔细挑选研究项目，把自己的精力放在真正值得关注的话题上。他认为他在工作中十分努力，但同时，生活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家庭是他的幸福源泉。



Bryan Graham 教授授课

前清华大学教授文一： 中国的发展，要分阶段稳步向前

人物名片

文一教授的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包括商业周期和经济波动理论，动态优化中的多重均衡和市场失灵，货币政策和量化宽松政策的微观基础与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发展政治经济学和中国宏观经济发展问题等等，著有“The Making of an Economic Superpower—Unlocking China’s Secret of Rapid Industrialization”，《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批判纲要》等作品。



2019 年 12 月 17-18 日，文一教授受邀参加我院主办的香港科技大学 - 暨南大学 2019 宏观经济学学术会议，并发表关于金融危机后的全球贸易崩溃的主题演讲。会后，笔者有幸采访到了这位宏观经济学领域的顶级学者。对于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方向，他有哪些怎样的见解？对该领域学者他又有哪些建议呢？

“希望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一些启示是我写书的初衷”

2016 年 6 月，文一教授《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批判纲要》一书发行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商界和媒体的高度关注和热议，不少读者给予了“这是一部杰作”、“这是一本剧力万钧的磅礴巨著”、“它回答了长期以来一直困扰我的现代经济学理论无法解答的一个难题”、“这是一本非常有

趣的书，既具有启发性又具有实质性”等好评与认可。

文一教授向笔者介绍了他写作这本书的初衷。中国崛起的根本原因，并不能从西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得到很好的解释。对学术有着满腔执着和热忱的他，决心要解答这个一直萦绕在心中的大问号。在这个过程中，他将中西方理论进行融合，系统且深入地剖析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历程，发现了其中曾被理论界忽视的，却正是对中国崛起起到重要作用的因素——政府。

他解释道，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很重要。政府既要有意愿，又要有能力。政府通过市场监管来把控市场经济，把市场上一些不良的风气给“压”下去，这样才能完成整个发展过程。他指出，市场本身不是天生的，而是一个公共产品，它需要国家力量去培育、

孵化和创造。只有国家力量才能创造出一个统一的大市场，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也要不断提高。

“经济发展是个演化的过程，不同阶段做不同的事”

在谈及国家未来的发展时，他表示，中国的发展，需要走过多个阶段，从轻工业阶段起步，形成轻工业产品市场后，创造一个更大的市场来形成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这之后重工业革命暴发阶段才能出现，国家实现量化生产，用机器生产机器。接着，国家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这也正是中国需要跨越的一个阶段。当顺利越过农业现代化和金融现代化阶段后，中国最后才能真正进入福利社会阶段。文一教授强调中国需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走，不能把顺序弄反了。他指出，中国要迈过这些坎就要注重管理。随着经济越来越复杂，分工越来越细化，社会的治理成本会越来越高。因此，政府要随着经济阶段的升级从原来初级阶段的直接介入型政府转变成管理型政府，提供更多公共服务。

“研读历史并保持清醒，是当代青年学者最需要做的”

在笔者询问文一教授是否能为从事经济学领域研究的学者以及当前国内高校的教学育人方案提供一些建议时，他真诚地表达了他的想法。他认为，经济学家应该好好研读历史，研究西方的工业化历史，从其中提取有用的信息。其次，关于高校教学育人方面，他强调历史教育正是中国当前教育需要改进之处，政府、高校应该加大对这一块的投入，改革教学内容。他指出，所谓的课程改革，不单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知识的传授，还要注重工业化历史这个点。课程需要从经济基础角度展开深入分析，让学生从西方的工业化历史中吸收有益的营养。

在访谈的过程中，文一教授向笔者描绘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讲述了一个大国通过“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相结合的和平崛起历程。笔者从中也深切地感觉到了文一教授对宏观经济学孜孜不倦的钻研精神确实来源于他对所从事领域的热爱。投身研究之余的他，仍不忘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反复提到“要学历史，人人必学”，心系中国的青年与未来。



文一教授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王能教授：“授人以渔”，培养独立思考型人才



人物名片

王能教授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房地产与金融学教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资产定价、公司金融、宏观经济学以及房地产金融学。在国际顶级经济学和金融学刊物上发表多篇文章。

2019 年 12 月 17-18 日，王能教授受邀参加我院主办的香港科技大学 - 暨南大学 2019 宏观经济学学术会议，并进行题为“Leverage Dynamics and Financial Flexibility”的主题演讲。借此契机，笔者有幸对王能教授进行专访。这位在金融学领域颇有建树、深受学生们喜爱的教授从更广泛的角度剖析金融经济的现状和发展，也对如何学好、教好金融学这门学科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教学，要做到‘授人以渔’”

王能教授曾任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在高校倡行金融学科国际化教学的阶段，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在王能这位掌门人的带领下，迎接挑战，不断探索，成为现今具有国际前沿水平、符合中国金融经济发展需求的高质量人才培养基地。

多年的经验，让他在高校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方面有着独到见解。在谈及金融学这门学科有什么教学秘诀时，他坦言，把“授人以渔”这一点理清、落实就是秘诀。他补充道，金融学是一门严谨且实用性很强的学科，需要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和独立思考，分析问题、剖析问题，然后解决问题、寻找答案的能力。其次，金融学还需要在教学的过程中培养学生学以致用能力。书本知识的简单传授已经无法满足当前金融学的教学需求，如今的金融学课堂需要师者对知识有足够深刻的了解，把复杂的知识点简单化，深入浅出地开展教学。同时，师者也需要抱着“活到老学到老”的态度，不断地为自身的知识库注入“活水”。

“学会独立思考很重要”

从小，王能教授就是大家口中“别人家的孩子”，15 岁时考进南京大学少年班学习物理化学，之后于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化学硕士学位、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获得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并于 2002 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获

得金融学博士学位。由于理工背景出身，人们曾对他抱以“所以读金融学肯定很有优势”的误解。他笑着说道，这是把因果关系和关联关系弄混淆了。数学模型对于经济学、金融学来说只是一门工具。很多人认为做经济学金融研究就是推公式或者把数据拿出来，把它套进公式里进行分析。其实这只是表象，在真正做研究的时候并非如此。他解释道，在做研究时遇到需要做假设或者使用数学工具的时候，研究者要思考一个问题：解决问题、提出政策建议时，学者需要有清晰的逻辑，尽量用简单的模型把结果表达出来，分析结果越丰富越好。过于复杂的模型对于读者来说是有成本的。对于学者来说，研究的问题要尽量足够的重要，研究课题要有一定的原创性。当然经济学金融学理论基础和一些常用的数学工具也是必要的。

他谈到要把经济学、金融学学好，知识积累的宽度和深度同样重要，不仅要熟练掌握基本的理论知识和足够多的数学工具，对整体框架有清晰的认识，还要学会学习，对知识充满好奇、渴望和执着，善于积累，让自己有足够宽阔的视野。“看到树，更要看到森林。”另外，他强调道，学会思考，很重要！学生应在尊重老师的前提下，进行独立思考，在思考问题、解答问题的过程中把逻辑梳理清楚，这样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把这门学科学好、学活。

最后，他一边比划一边笑着补充道，“exercising regularly”也很重要。



王能教授

“抱着一种开放和拥抱世界的心态迎接机遇和挑战”

对于国家金融经济领域有哪些热点问题，王能教授也表达了他的些许观点。

在经济金融越来越开放的背景下，王能教授认为，经济全球化早已成为趋势，全球经济只会越来越更加相关联。这就意味着存在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不少挑战。宽松的金融政策导致金融体系存在一定风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本着一种开放和拥抱世界的态度，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继续坚持改革，用长远的眼光去制定相关政策。

其次，对于金融学未来的研究方向，他从公司金融以及财富分配两个切入点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公司金融方面，他指出，把影响公司和企业家决策的一些重要的考虑因素应用到均衡模型里面来，对一些宏观问题展开研究，将会显得越来越重要。财富分配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关政策制定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

在访谈的过程中，王能教授风度翩翩，耐心地解答了如何学好、教好金融学等问题。在访谈最后，他向笔者表达了他对本次举办的宏观经济学学术会议的高度认可，认为这是他参加过的高质量最高的宏观经济学学术会议之一，并对 IESR 未来的发展寄予厚望。

IESR 人物

接中国地气，解扶贫问题 ——专访 IESR 副教授蔡澍



人物名片

蔡澍，IESR 副教授，于 2016 年获得香港科技大学博士学位，他的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研究成果发表于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China Economic Review 等国际知名期刊，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2019 年 10 月 17 日，值第六个全国扶贫日之际，本文特梳理 IESR 副教授蔡澍发表在发展经济学领域顶级期刊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的独立作者论文《Migration under Liquidity Constraints: Evidence from Randomized Credit Access in China（流动性约束下的乡城劳动力迁移：来自中国随机对照试验的证据）》的研究过程和成果，以飨读者。

“随着中国扶贫工作进入攻坚阶段，大水漫灌式的扶贫已经难以奏效。”蔡澍更加关注那些落入“贫困陷阱”的家户：“穷则思变”，但对于一些家庭来说，他们缺乏“变”的资本，最终只能囿于现状。蔡澍发现，“贫困村互助资金”项目显著改善了那些“欲变而不能”的家庭的经济状况。“贫困村互助资金项目一定程度上契合‘精准扶贫’的理念。”

与此同时，国际学术界却传来不同的声音，“贫困村互助资金是‘小额信贷’的一种具体形式，小额信贷是国际学术界使用的术语。国外的学者在印度、蒙古及非洲各国进行小额信贷试验后却发现，小额信贷并未提高贫困农户的收入。”

国内外不同的实践结果引发蔡澍的思考：应该如何解读小额信贷在中国取得的成绩？对中国现实问题关切，是他研究的“初心”。

课题缘起

早在 2006 年，中国开始在农村地区进行“贫困村互助资金”的试点。2010 年，蔡澍所在的研究团队受政府委托，设计并实施了一项关于小额信贷的随机对照试验，评估小额信贷在扶贫工作上的成效。

试验在湖南、四川、河南、山东、甘肃五个省份展开。评估组首先在各样本省选出两个贫困县，再在每个贫困县中选出五个贫困村。在每个县的五个贫困村中，评估组随机选择三个为试验组，发放小额信贷资金，其余为对照组。“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地方差别较大。试验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选择同一个县内的村庄，客观存在的差异会较小。”

随后两年，评估组对试验农户进行跟踪调查。评估组发现，得到小额信贷帮助的家户，无论农业收入还是外出务工收入都上升了。试验组家庭对农业生产的投资明显增加，如更多从事经济作物生产、加大畜牧业饲料的投入。同时年轻劳动力更多选择外出打工。

“有意思的是，在这一时期，其他国家也有多个研究小组在做类似的随机干预试验。”然而，国外的试验结果表明，小额信贷的扶贫效果有限，这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在这一国际背景下，中国小额信贷的成功令人瞩目。

接中国地气，解中国问题

对问题的研究往往只有通过理论构建才能更加深入。从经典的劳动决策模型出发，蔡澍却发现模型的预测结果与现实数据恰恰相反。蔡澍深入分析了经典模型的前提假设：经典模型一般在完全的劳动力市场下考虑流动性约束（即资金不足）问题。所谓“完全的劳动力市场”，指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蔡澍发现，这一假设明显不符合中国的情况。

“可以说，论文的核心思想最初来自于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在中国，城乡二元化明显，乡城流动成本高，对于贫困人口来说尤其如此。为了衡量流动成本，蔡澍考察了迁移所需的交通费，以及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获得工作前所需的生活费。引入“预付迁移成本”这一概念之后，蔡澍发现，新的模型的预测与在中国的观测结果相一致。

蔡澍证明，在不完全劳动力市场和流动性约束下，小额信贷的减贫效果存在着不一样的机制。在完全劳动力市场下，小额信贷将为家户提供农业投资的启动资金，

进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减少人口迁移。然而，在迁徙成本较高、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小额信贷既提升了家户的农业投资，也提高了人口迁徙率；此外，在更加贫困的地区，小额信贷对人口迁移的促进作用更大。蔡澍的模型也通过分类讨论劳动力市场摩擦的存在与否，利用统一的理论框架解释了国际上对小额信贷成效的争论。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蔡澍对人口流动阻碍因素的识别，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已有研究表明，人口流动受阻所导致的劳动力资源错配，将进一步阻碍贫困人口脱贫和社会生产率提高。因此，对人口流动阻碍因素的识别及消除，将有助于进一步释放中国发展的潜力。

值得一提的是，自 2016 年起，小额信贷开始在中国全面推广。相信“小额信贷”这一利器，会在扶贫攻坚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结语

作为博士毕业不久的“青椒”，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的学术平台年轻而富有活力，让蔡澍感到很满意。学院自 2015 年成立以来，对接国际前沿，根植中国现实，为各位老师提供最佳的发展平台。发表学术生涯上的第一篇独立作者文章，蔡澍收获良多，“从首稿到终稿，相当于独自把从选题到发表的科研过程走了一遍。期间得到了太多人的支持和帮助，经历了不少磨砺，也收获了自信。”

接下来，蔡澍还会在农村小额信贷的问题上继续耕耘。他正在考察小额信贷项目对农村的社会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如亲朋借贷会不会消减。“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但社会关系的量化更困难，挑战更大。再接再厉！”

做好研究，教好学生 ——IESR 新晋副教授陈祎专访



人物名片

陈祎的研究领域包括劳动经济学、家庭经济学、人口经济学、教育经济学，他的研究成果已发表于著名国际期刊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及国内权威期刊《经济学（季刊）》，并主持了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

2019 年 9 月，经研究院（IESR）升职评审委员会评审、学术委员会审核通过，研究院助理教授陈祎成功晋升副教授。

科研之路没有坦途

陈祎在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上发表的文章题为“Explaining the Decline of the U.S. Saving Rate: the Role of Health Expenditure”。这篇论文从医疗支出这一视角出发，探究了美国家庭储蓄率下降的原因。文章指出，国民收入账户（NIPA）中的医疗总支出分为两部分——家庭自身的现金支出和医疗保险支出（包括公共保险和私人保险）。家庭在做储蓄决策时一般只考虑自身需负担的现金支出，而国民收入账户里则将医疗总支出纳入家庭支出模块。美国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医疗总支出飞速上涨，但家庭自身所负担的部分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一直比较稳定。由政府买单的公共医疗保险支出不断上涨，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国政府财政赤字不断增加的原因之一。

这篇论文说明，同样一个经济变量（如：储蓄率），在家庭层面的定义和在国民收入账户的定义可能存在差别，并且这一差别可以解释一些重要的经济事实。这一点对中国同样具有启示意义。比如，在统计局的国民收入账户中，我国家庭储蓄率长期保持在高位，在 2010 年甚至超过了 50%。但这些宏观的数字不但和我们日常生活感受不符，也大大高于入户调查（如：城镇入户调查）所计算的储蓄率。因此，国民收入账户中的储蓄率在多大程度上能解释我国居民真实的储蓄行为，对理解我国微观层面上的家庭行为有重要的意义。

回忆起在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发文的历程，陈祎感触颇深。“以前看文献时难以体会发表文章的艰辛，要自己经历一次才会知道。”这篇文章从最初版本到最终版本间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得到期刊反馈的修改意见之后，我经历了 4 个月高强度的修改工作。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查看邮件，跟合作者沟通今天有哪些问题需要处理，几乎天天修改到深夜。”陈祎说：“这都不算是时间长的了，我感觉我还挺幸运。”文章发表后，陈祎的心情与其说是激动，倒不如说是感



陈祎参加我院举办第二届“微观经济数据与经济学理论创新论坛”并作论文报告

觉心中一块巨石落地，如释重负。他认为在科研工作的不同阶段，感受也会有很大差异。当一个项目处于探索阶段时，从数据里发现一些新的事实，会让人有很大的成就感，完成初稿时亦然，但这之后还有很多艰辛的过程在等待。

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陈祎在赴美国留学前已经在本科导师的指导下进行了很多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对于如何做中国问题研究他也谈了谈自己的体会。陈祎坦言，就国外的期刊（尤其是顶级期刊）而言，同样的研究问题以美国为研究背景确实比以中国为研究背景更容易被接受发表。这是一个必然现象，并且未来很长时间应该也不会有什么改变。中国学者在冲击顶级期刊时需要思考如何让其他国家的读者也对中国研究产生兴趣？陈祎谈到了自己和合作者正在进行的知青对农村教育影响的研究。他们通过阅览三千多本县志，提取其中有关知青的详细数据，并利用不同地区接收知青情况的人数差异，来评估知青对当地教育的影响。这个研究的出发点其实是人力资本的外溢性，尽管“上山下乡”是一个中国特定环境下的事件，但人力资本的外溢性可能是整个经济学界都感兴趣的话题。

在另一项研究中，陈祎与合作者利用某公司人事数据发现女性在孩子出生后，尤其是孩子 0-3 岁阶段，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这确实造成女性的劳动生产率

（用计件工资或绩效考评来度量）出现短期下降。这一研究与不久前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有极大的政策相关性。这一纲领性文件为此前基本上处于政策空白区的 0-3 岁照护服务提供了国家级的发展指导意见，让婴幼儿的人力资本发展、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问题重回政策热点。陈祎希望自己的学术成果能与政策决策相结合，为相关问题的解决献计献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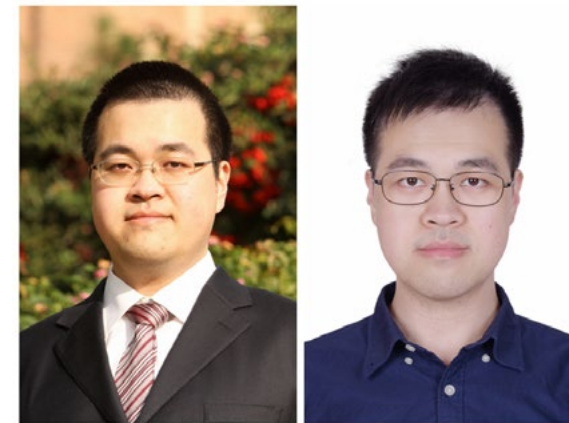
陈祎认为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有越来越大的发挥空间，包括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及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等国际期刊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比例也越来越高。与此同时，一些中文期刊在评价教师科研水平时的权重也越来越大。陈祎认为研究者不应被考核标准束缚住手脚，还是应该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做一些自己觉得有用或者正确的事情。

教书育人首先要正己“修身”

作为一位高校“青椒”，教学工作是重中之重。陈祎在 IESR 为本科生教授数据分析统计软件。备课时，他总会设身处地地想自己是学生的话最想学习的内容或技能是什么，并按此设计课程内容，“我授课时并不拘泥于任何一本教科书，每一页幻灯片都是自己编写的。”正是凭借着这份用心，陈祎的课程收获了同学们的一致好

评，同学们纷纷表示“陈祎老师的课内容翔实丰富，生动有趣，干货满满，这是最棒的一门课。”在去年的教师满意度考核中，陈祎名列前茅，荣获 IESR 年度优秀教师称号。教书育人首先要正己“修身”，陈祎对学生高度的责任感体现在教学工作的每一个细节中，他对待科研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广博精深的知识素养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

“修身”不仅体现在精深层面，还体现在形体方面。3 年的自律生活（控制饮食、规律锻炼）让陈祎成功减重超 50 斤。陈祎的微信头像是一只憨态可掬的熊猫，选择这个头像一方面是因为陈祎特别喜欢熊猫，另一方面是觉得熊猫的体形和稳重的风格和他自身有各种神似之处。陈祎笑着说：“现在看来外形跟熊猫不太相像了。”



陈祎“修身”前后对比图

IESR 最大吸引力是一流的学术环境

陈祎现阶段有两个“小”目标：一是在经济学 Top 5 的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二是希望自己的研究能真正对政策制定产生一次影响。对于 IESR，陈祎认为这是国内最能促进年轻学者自身发展的平台之一，“做学术一定要对新事物有敏感性，这样才能保持在学术的最前沿。”而 IESR 打造的高质量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则为年轻学者了解学术前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诺奖得主 James Heckman 多次来访 IESR，获得与这样的顶级学者交流的机会对年轻学者来说太重要了。“如果不是有 IESR 这个平台，我们以个人之力与这些大牛接触基本是不可能的。”陈祎表示与这些顶级学者交流对自身很有启发，“他们让我真正体会到那句

网红语——比你优秀的人还比你更努力。”他告诉笔者，James Heckman 今年暑假来访期间，花了一整天时间认真听取 IESR 年轻学者的论文报告，“像我听一整天论文汇报肯定会非常疲惫，可年过七旬的 Heckman 却能全程保持专注并对每一篇论文都提出建设性的意见。”Robert Moffitt 教授则更让自诩“努力派”的陈祎甘拜下风，“Moffitt 教授来访的两周中，每天我一早来到办公室都能看到 he 工作的身影，每天晚上我下班时，他依然在工作。”

陈祎认为 IESR 的学术氛围不仅体现在顶级学者的来访，同时也体现在日常丰富的 seminar 和学术活动。“不是正在参加学术活动，就是在参加学术活动的路上，这可以算是 IESR 人的真实写照。”陈祎幽默地说道。

陈祎还赞扬了 IESR 内部团结、合作的风气。以今年的自然科学基金申报为例，IESR 将全职教师队伍分为若干小组，在小组长的带领下准备申报工作，同时还举办自科动员会，由申请成功的同事分享经验。在正式提交申请报告前，IESR 还开展了拟申报教师主题汇报、校外专家评审会等。功夫不负有心人，作为 IESR 在 2019 年获批的 11 项自科基金项目之一，陈祎申报的课题“性别工资差异的动态演进及形成机制：来自公司人事数据的实证研究”也成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的资助。

近年来，IESR 高质量研究成果频出，学术声誉与政策影响力不断提高，这离不开 IESR 良好学术环境的大力支持，更离不开像陈祎这样年轻学者的积极努力。未来，IESR 还将继续为年轻学者的自我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学术交流平台，为中国经济学走向国际舞台贡献力量。

学生天地

“挑战杯”国赛

珠江经济学俱乐部

“挑战杯”国赛



我院学子在第十六届“挑战杯”
国赛中荣获二等奖



11月12日晚，由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教育部和全国学联共同主办的第十六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以下简称“挑战杯”）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顺利闭幕。“挑战杯”被誉为当代大学生科技创新的“奥林匹克”盛会。全国各地众多高校积极参与竞赛，并派出代表团参加观摩和展示。据了解，本届竞赛在1573所高校举办，近300万名青年学生参与了校级赛事。经过省级赛事的选拔，内地共有1513件作品参加国赛。预审环节后，786件作品拟授三等奖，426件作品入围决赛。

当晚，我院2016级经济学（国际化创新班）本科生鄢瑜、龙绪坤、邹淑源组成的团队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传来喜讯，她们的参赛项目《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就业的影响——基于中国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从参与本届竞赛决赛的众多项目中脱颖而出，获得本次“挑战杯”国赛经济类本专科组二等奖的佳绩。

项目立意心系社会 脚踏实地献计献策

近年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机器人的面世，引起学界的广泛争论，部分学者认为大量的机器人应用将代替劳动力而导致失业率上升。另一方面，一些学者认为机器

人的应用会创造人类拥有比较优势的全新就业岗位，从而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自 2017 年开始，鄢瑜、龙绪坤、邹淑源三位同学就已经关注这一问题。恰逢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报告提出了与就业相关的指导精神，在这一大背景下，经过团队成员之间及与指导老师张思思的多次探讨，三位同学决定立足国情，探究机器人对就业的影响，希望能为解决人工智能背景下的结构性就业矛盾提供政策建议。

确定了立意方向后，三位女孩明确团队分工，搜集文献、查找数据、数据处理、数据分析、实地调查做问卷等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龙绪坤在采访中回忆道，在 2018 年春运期间，她们在四川、江西火车站随机访问了符合受访条件的 162 名外来务工人员，对他们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对其中的部分受访者进行了深入访谈。在这个过程中，她们深切地感受到外来务工人员并不了解工业机器人会对自己的就业带来何种影响。通过访谈，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对她们的研究寄予了深切期望。他们期待这一研究成果能真正对解决自身的就业问题带来帮助。正是这一份份期望，让这三位同学有强烈的使命感与动力去探究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经过长达两年的研究，她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在中国的背景下，工业机器人的应用整体上增加了企业的就业需求。然而在危险性较大的行业，机器人对劳动者具有积极的替代作用。就产业而言，机器人对制造业的就业没有明显影响，但对服务业的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同时，她们就以上调查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首先，政府应将一定比例的企业引进机器人的补贴用于低技能劳动者的转岗培训，实现部分员工在企业内部转岗，以减少工作的搜寻成本；另外，政府应加大对高风险行业机器人引进的融资补助和财税支持，以实现危险、有毒、有害工作岗位的无人化。最后，政府应引导被机器人代替的员工转向服务业等更有发展潜力的行业。

这份“果实”或许尚且不够丰满成熟，却凝结了她们对国对民最真切的情怀。同时，本次“挑战杯”竞赛得到的荣誉将成为她们未来继续向前的动力。

不断挑战自我 从不轻易言弃

一个想法从书面计划到落实执行是一个十分困难的过程，这期间会遇到种种挑战。在谈及完成项目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时，三位同学都纷纷表示“数据”这一块是她们研究过程中“最大的绊脚石”。由于无法获得精确的数据，她们只能对各个省机器人的数据进行预估。由于数据是预估的，研究结果受到了一些质疑。一次偶然的机，鄢瑜同学在与我院谷一桢老师交流讨论的过程中得知海关总署记录的企业进出口报关数据里面可能会有她们研究所需要的数据。“我们立马就去找，结果真的有！然后我就想可不可以把海关的企业进出口报关数据和工业企业的数据进行匹配，这样就可以得到企业层面的机器人应用数据。最后证明，这一方法是可行的！”鄢瑜激动地告诉笔者。

她们还提到，处理数据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繁琐的过程。由于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企业的 ID 不能跨年份唯一识别，她们按照“序贯识别法”对数据进行了处理。用于处理的代码十分繁琐，经过一次又一次尝试和修改，才达到了文献的效果。接着，她们对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这两个大型数据库进行匹配。由于两个数据库没有一致的企业身份编码系统，她们利用企业的其他信息分两步进行匹配。为了提高匹配率，她们不断完善代码，最后终于成功匹配上了 30% 左右的海关数据库中的企业。

除了在研究调查上遇到不少难题，她们在平衡日常学业和准备“挑战杯”竞赛两者之间关系时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考验与挑战。“由于精力和时间有限，为了能够兼顾好两者之间的分配，我们就得从休息时间里挤出时间来做好这两件事情”，鄢瑜还跟笔者分享了自己为了不影响项目进度，在寒假返校的高铁上写论文的趣事。

多方支持 是旅途中最暖最有力的存在

“真的十分感谢学院各位老师和调查中心！”三位同学在与笔者交流的过程中，多次提到了对我院教师和调查中心的感激之情。项目指导老师张思思、副院长谷一桢、院长助理朱宏佳及其他多位老师对她们不遗余力的关心、支持与帮助，是她们坚持下去的不竭动力。同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她们一筹莫展无法得到精确数据时，我院调查中心提供的数据使得“柳暗花明又一村”，让项目得以继续进行。

张思思告诉笔者，“学院高度关注这个项目，常常组织老师们给项目提改进意见，对项目的提升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她还跟笔者提到，学院计量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基础课程以及 Stata 技巧等实操课程，让学生们掌握严谨的研究方法并增强了他们对大数据的处理能力。比如，鄢瑜她们这次就使用了 DID 和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的方法，并熟练应用 Stata 技巧将工业

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两个大数据库合并进行分析。

一直以来，我院社会调查中心组织开展了多项如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中国家庭就业调查大型社会调查项目，为同学们提供了实践的平台，培养学生研究现实问题的能力。邹淑源也曾参加过我院调查中心开展的调查项目，她告诉笔者，在参加学院组织的调查项目的过程中，她学会了在做问卷调查的过程中怎么与人进行沟通交流。这个经验对于实施项目中间卷调查的部分很有帮助。

“挑战杯”团队最终在国赛中斩获佳绩绝非偶然，这是团队成员的坚持不懈、学院层面的高度重视和张思思等多位教师悉心指导下结出的“硕果”。我院“培养兼具国际视野、立足现实国情，能运用科学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优秀人才”这一育人理念造就了敢于挑战自我、心系国家的学子。梦想仍在继续，还有一群拼搏奋进的学子正扬帆远航。



鄢瑜与龙绪坤在“挑战杯”全国决赛现场

珠江经济学俱乐部



IESR 李润梁老师带你快速入门数据可视化



李润梁老师

在信息过载的大数据时代，如何高效地整合与呈现大量数据成为一个挑战。而数据可视化最重要的优点就是能帮助人们更快地解读数据。那么如何实现数据可视化的快速入门呢？

2019年12月5日，IESR 助理教授李润梁在暨南大学番禺校区恒大教学楼为同学们开展了一场题为“数据可视化快速入门”的讲座，这是我院珠江经济学俱乐部开展的第八期活动。本次讲座，李润梁老师为同学们精心准备了一个基本函数的大礼包，帮助大家实现数据可视化的快速入门。

讲座伊始，李润梁老师根据自己的 MATLAB 编码进行了经验分享，对编码进行系统、细致的讲解。在短短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李润梁老师作图从平面到立体，从散点图到柱状图，通过展示编码和编码运行成果，同时结合板书和作图操作，带领同学们了解了 MATLAB 的作图流程，逐步走入 MATLAB 的大门。

整场讲座下来，同学们收获颇多。课下有同学对于讲解的内容提出了疑问，老师一一进行了解答。也有同学表示李润梁老师对编码解释细致，相信即使是对 MATLAB 刚入手的同学也可以跟上老师的节奏。



李润梁老师答疑解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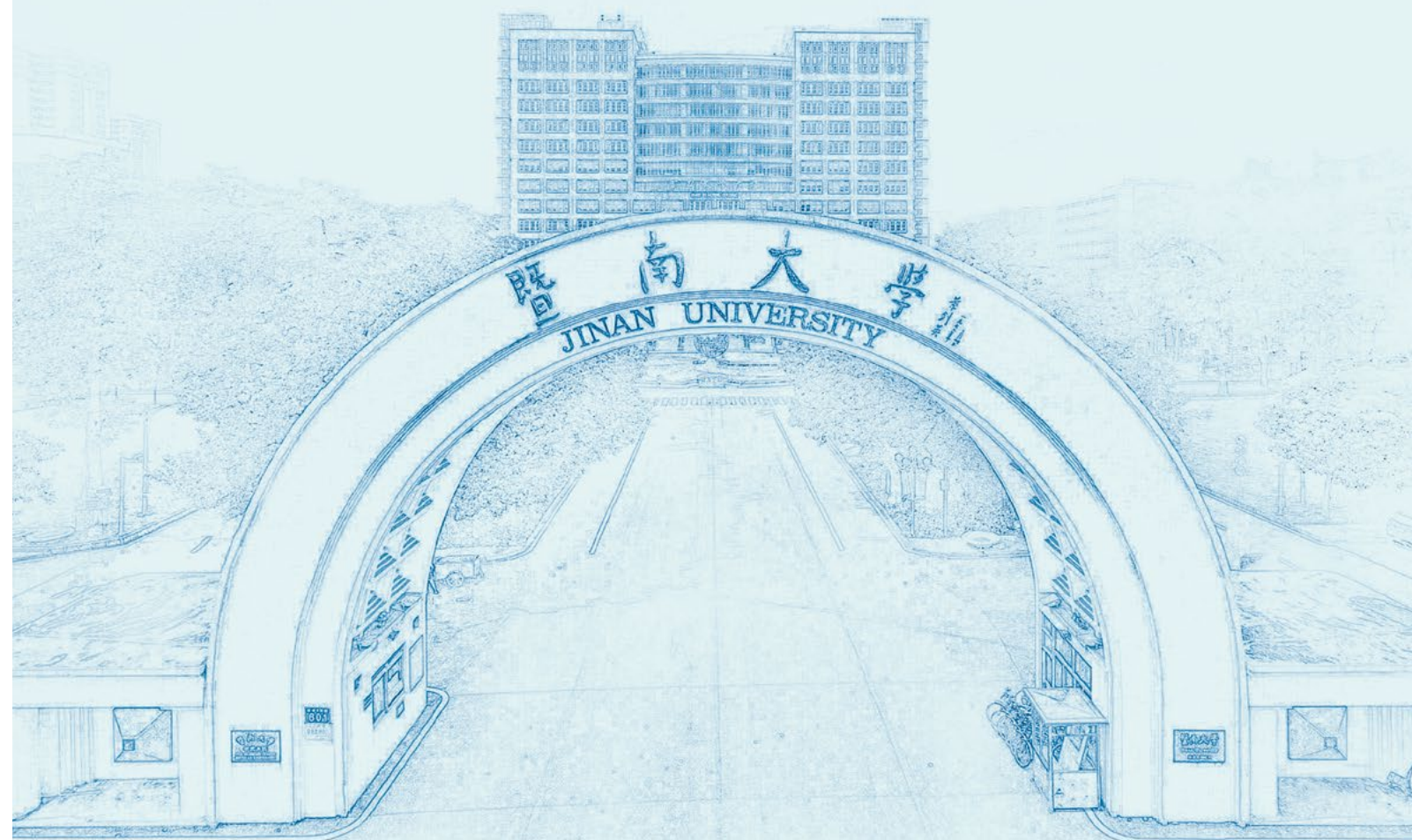
对外交流

冯帅章院长一行访问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多伦多大学朱晓冬教授来访我院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一行来访我院

社会调查中心受邀参加第三届社会抽样调查理论与实务论坛暨社会调查创新发展研讨会



冯帅章院长一行访问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分享会现场

2019 年 10 月 16 日上午，IESR 院长冯帅章教授、院长助理崔潇濛一行受邀访问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教授、副院长王鹏飞教授对冯帅章教授一行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双方从人才引进、学生培养、社会调查、智库建设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并就可行的相关合作展开热烈讨论。

下午，冯帅章院长与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的师生进行了交流。他首先从制度、科研、数据、智库、学生这五个方面对 IESR 三年多的发展进行了简要介绍，之后冯帅章院长分享了 IESR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工作方面的经验。

冯帅章院长表示 IESR 高度重视国家级项目申报工作，在过去两年中逐步推行申请工作的常态化、制度化。同时，IESR 通过举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内部讨论会、校外专家评审会等方式给教师的申请计划提出改进建议。

冯帅章院长还分享了自己个人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经历。他建议大家努力申请，不要被一次失败所打倒。设计研究时要考虑得尽量周全一点。成功申请后要排除困难，认真去做，而且要长期坚持。最后，他建议大家将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结合起来，让研究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



双方交流现场

多伦多大学朱晓冬教授来访我院



讲座现场

2019 年 10 月下旬，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朱晓冬教授来访我院。朱晓冬教授在宏观经济学、经济发展、中国经济等领域有深入研究，关于中国问题的多篇研究成果发表于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等国际顶级期刊。

来访期间，朱晓冬教授为暨大师生作了题为“Selective Migration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Gap: Evidence from China”的讲座。讲座伊始，朱晓冬教授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劳动生产率差距。人均非农业 GDP 之间的差距是 5:1，而人均农业 GDP 之间的差距是 70:1。目前的文献对这种差距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1）无法观测到的自选择效应；（2）跨部门转换工作或地区迁移的障碍。

相关数据表明，中国农业部门的生产率显著低于非农业部门。朱晓冬教授首先利用 2003 年至 2013 年农业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来建立个人固定效应模型。然而个人固定效应并不能解释中国农业和非农业部门间的生产率差异。在此基础上，朱晓冬教授建立了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选择模型（comparative advantage model），并利用新农保计划的推行作为工具变量。研

究结果表明，人口流动方面存在的障碍对中国农业和非农业部门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影响巨大。

此外，朱晓冬教授还结合自己的经历，与 IESR 师生分享了他对于做中国问题研究的体会。朱晓冬教授在博士期间和职业生涯早期主要从事理论研究。他开始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原因是看到当时的经济学研究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在中国发生的经济现象。出于强烈的兴趣，他开始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中国问题的研究当中。在职业生涯早期，面对严苛的长聘考核，这种研究方向的“转向”其实带有很大的风险。但朱晓冬教授认为，研究者应该去研究真正有价值的问题，不应因为潜在的风险而选择做“安稳”却不够重要的研究。此外，他还谈到了了解中国现实情况对开展中国问题研究的重要意义。相比朱晓冬教授当年在海外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国内资讯时遇到的困难，身在中国的年轻学者们现在拥有更加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座谈的一个小时时间里，IESR 教师与学生踊跃提问，现场气氛热烈。

最后，朱晓冬教授还与我冯帅章院长就学科建设、科学研究、青年教师队伍建设、国际交流合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在了解我院的发展情况后，朱晓冬教授高度赞赏了我院的发展模式，并希望我院能够继续坚持国际化的发展道路。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 研究院一行来访我院



分享会现场

2019 年 11 月 11 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以下简称“人大国发院”）一行来访我院。来访人员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马亮，内参编辑部编辑张雯婷，国际合作部主管胡唯哲，博士后黄清子。我院副院长、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思思，院长助理卢晶亮，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武茜与来访一行进行了深入交流，双方就智库建设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经验分享。

马亮首先介绍了人大国发院在师资队伍建设、考评机制、智库成果评价机制等方面的经验和探索。张思思

以及卢晶亮也相继介绍了我院高度自主的教师评聘制度，数据为基、关注民生的智库发展特点等。人大国发院作为国家高端智库，具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和多元的资政报送渠道，我院作为暨南大学综合改革示范实验区，具有高度自主权和国际化的学术氛围。双方表示，未来将在开展智库品牌活动等方面探索更多合作可能性。

社会调查中心受邀参加第三届社会抽样调查 理论与实务论坛暨社会调查创新发展研讨会



与会人员合影

2019 年 11 月 22 日至 23 日，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受邀前往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参加“第三届社会抽样调查理论与实务论坛暨社会调查创新发展研讨会”。此次会议由社会调查中心执任何李芮携同执行督导李凤槐、数据分析员陈嵩晗出席。

会上，各高校的专家学者先后分享社会调查实践中的前沿理念与研究经验。

本中心执任何李芮则向参会学者和行业同仁分享了一项基于广东千村调查项目数据所做的研究，内容是关于方言对数据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使用方言访问会显著地增加访问时长，使用方言样本的无效答题比例略高于普通话样本，方言样本的访问规范性低于普通话样本。发言最后，何老师还和在座的嘉宾就在具体访问过程中如何更好地使用方言访问、方言访问所需的读题方式和问题设计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中心团队与参会的专家学者交流了社会调查的学术理念与实践经验、社会调查研究及智库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社会调查创新发展的思路与合作展望等方面的问题，获益良多。

此后中心仍将继续以高校地域、科研特色为依托，与各高校合作积极开展社会调查，不断创新，切实做好学术交流和微观数据收集工作，为国家和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真实、可信、有力的数据支撑和智力支持。

图说

运动会

